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7期

目录

【专稿】

于向真 邂逅新加坡议员

【往事】

刘家驹 志愿军尸横加里山

【人物】

郭罗基 为党国立“新统”

——冯友兰散记

【读片与读书】

启 之 《不夜城》——爱国主义与自食其力

舒 声 聂元梓是一本怎样的书？

【文摘】

宋永毅 精神病理学·性生活·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动

【季刊简介】

发刊词

投稿须知

征订启事

【读者来信】

1. 如雪勘误

2. 蒋健纠错

【资料】

文革前期毛泽东与其同事的合照（张晓良提供）

【本刊声明】

【专稿】

邂逅新加坡议员

于向真

昨天儿子忙里偷闲回家一趟，跟我们老两口聊了会儿天。一直以来，特爱跟儿子聊天，从年轻人那里受到启发，学到新知识。昨天儿子主要说了两件事，“邂逅议员”和“矮小女工”，从两个不同角度反映出新加坡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案例，挺有趣的。

为便于叙述，下面以我听到的儿子的口吻先讲第一件事：

到新加坡工作后，我俩（我儿子儿媳）和温蒂（儿媳的同事）在红山租了一套组屋住。一年半后的一天，我到淡滨尼小区见个朋友，到的有点早，下公交车后，站在街旁允许抽烟的地方（新加坡规定，在非吸烟处吸烟会被罚款）等朋友。

一位40来岁的先生正好也走向这儿，他热情地用英语朝我打招呼：“嘿，见到你很高兴！”边说边伸手表示要握。我疑惑地看着他，问：“您是？我们认识吗？”那位先生不但没因我拒绝握手而不快，依然和颜悦色地说：“看来你不是淡滨尼区的住户哦？”我奇怪道：“何以见得？”他说：“这里的住户几乎都认识我。”我更奇怪了，问：“怎么会都认识？您是？”“我叫XXX，我是议员。”他爽快地作答。“哦，您是议员，幸会幸会！”我知道新加坡的议员都是选民一票一票认可后当选的，被高看一眼是必须的。

我掏出烟，递过去“抽一支”。“No, No”，他连连摆手，同时掏出自带的香烟。我吸的是那种比较便宜的，一盒10元新币，以为对方嫌烟不好，没想到对方一边掏出自带的烟一边说：“议员是不可以接收选民的烟的。”儿子不以为然：“我不是这里的选民，再说一支烟算什么？”“哦，不可以的。”他态度非常决绝。

我们两人一边吸着烟一边随意聊起来，我告诉他，自己是从北京来这里打工的，住在红山一带，今天到淡滨尼见个朋友。议员听了，热情地说：“等下你朋友过来了，我买票请你们看电影。”我说今天没时间看电影，又笑问他：“连一支烟你都不吸，买电影票得自掏腰包吧？”议员说：“那当然了。”又诚恳地约

请：“以后你拿到身份，欢迎来淡滨尼买房居住，到那时记着投我一票，如果你认可我。”这么令人愉快的一个政客，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和他交谈感觉随意而温暖，我很认真地点头答应了。

说到这儿，儿子告诉我：“老妈，有个细节当时让我非常惊讶。那议员掏出来的烟，竟然是新加坡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香烟了，我一个打工的为节省，抽的是很便宜的10元一盒的，他吸的烟竟然是8元一盒最便宜的。这太让我意外了，也很好奇，假如抽廉价香烟是作秀，那他干吗花钱请普通路人看电影呀？这位议员何许人也？那天从淡滨尼回家后，我赶紧上网一查，淡滨尼议员果然有他的详细介绍，敢情这位只比我大几岁，又这么热情平易。抽最便宜香烟的议员相当了得，从小学、中学一直是李光耀奖学金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随即直接成为新加坡公务员，并且已经连任过两届议员了！”

说到这儿，儿子连连感叹新加坡太善于培养人才了。他告诉我，从邂逅淡滨尼之后，他又了解到一些该国如何选拔公务员，他们有一整套措施，其中包括从每一个孩子最初阶段开始跟踪，对于连续获得李光耀奖学金、品学兼优的杰出人才，会被国家保送进美国哈佛等一流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成绩一直突出的话，一毕业就被直接吸纳为公务员，发挥管理才能；最能干并有政治抱负的人有机会通过努力当选议员，在政坛上施展抱负。议员有优厚收入，有能力请他愿意请的选民看电影、喝咖啡或吃饭。当然所有政府性的活动费用是由辖区政府出资，不增加个人负担，其中的公私界限是清晰的，也是能够和必须把握好的。

新加坡的国会议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全国已注册的政党有24个，法律保障议会中有反对党的存在。集选区议员制是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独创，选民在42个单选区和13个集选区投票，淡滨尼是集选区中的一个。每个选区的议员，都要在指定的日子（通常是每月两次的晚7点至10点）接见选民，听取选民的心声。专家们分析新加坡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在野党，游戏规则有不合理的因素，另一个重要原因也由于在野党缺乏资源，难以吸纳最优秀人才的加入。

把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公务员队伍，是新加坡卓有成效的高效管理的前提。一旦从政，贪污受贿就是被国民极端鄙视、自毁生路的恶行。记得春节我们老两口在新加坡时，有一次儿子简单跟我说过前几年有个官员，因为贪污十万元，被报道后跳楼自杀了。

今天儿子说起邂逅议员的事，我又追问贪官自杀，儿子说：新加坡建国 50 年来，总共出过寥寥几个贪官都跳楼了。其实新加坡处理贪官一没有双规，二也不被罚挨鞭子，只是媒体曝光后，贪官的生路会被彻底断绝掉。制度优越，司法严明，贪官太稀少，偶尔爆出一个名声太大，加上百姓极端鄙视，贪官的名字会被大家记住的，他再没可能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了，于是，那几个被曝光的贪污者只能不约而同到那个（我没记住建筑物的名字）大厦跳楼去了，那么高的大楼有一面临海，那几个家伙直接掉进大海喂鱼去了。🐟

【专稿】

前炎黄副主编刘家驹先生积三十年，写作了 29 篇有关军队的文章，其中有回忆录、随笔札记、口述访谈。在互联网上或有所见，但多为断简残篇。现经友人编辑整理，复其全豹，本刊选其精萃，陆续发表，以飨读者。未经家属授权，谨请原谅。——编者

志愿军尸横加里山

刘家驹

在我军军史上，关于失利的战役，很少有翔实的记叙。那些有损我军“伟大、光荣、正确”的败绩，不但史实简略，还给修理得面目全非。比如，解放战争的 1948 年春，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仅有 5 个纵队七万五千人，彭德怀急欲打一次大战显显身手，他以配合我军的大反攻为由头，不惜老本地率 4 个纵队 5 万人马，3 百里奔袭宝鸡（古称西府），想出其不意，钻进敌人老窝捞一把就走，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遭到胡宗南联手马家军 11 个旅的夹击，损兵折将两万三（伤亡 14973 人，失踪、逃亡、病故 8407 人），要不是警卫人员的机敏，彭老总和他的夫人浦安修也成了胡宗南的阶下囚。这一史实，在我军厚重的军史记事上仅留下了两百字，“西府战役”的称谓没有了，改名为“外线出击”，不敢指出是彭老总指挥的失误，只说：“被敌人切断后路，处于被动态势”“突出重围”。如此混淆视听的军史，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都少见。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亲历的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这本是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被描绘成我军的“惨胜”，载入军史的是颂扬我军英勇顽强，战绩显著，是毛泽东的决策英明，损失不可避免，是面对最现代化敌人的必然付出。

我参加过五次战役，我所在的参战部队是12军第35师，李德生是师长。当时，我是师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战争开始，我受命登记伤员和带领挑夫班掩埋死者，我目睹了我们师5000多人，仅在两天的时间里是怎样倒在加里山战场的。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参加了12军的军史写作，搜集的第五次战役史料均真实可信，我采访的亲历者都说了真话，为我这个幸存者还原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在彭总身边的作战参谋王亚志告诉我，第五次战役是毛泽东确定要打的，彭老总把时间提前了。因为彭总担心刚从美国调来的两个师可能在元山港登陆，切断我军的后路，于是我军在损失惨重的第四次战役之后来不及休整，又匆忙从国内抽调来第3兵团和第19兵团，接着打第五次战役。彭总在给毛的报告中说，即使伤亡五六万人，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可以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迟滞敌人的登陆企图。

战役前，我军在三八线上摆开了10个军，4月22日开始，先从西线发起突击，我们师是先头，一直打到汉江边，斩获甚微，彭总不甘心，5月6号发出打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预令，把主战场放在中线，用我6个军去吃掉南朝鲜的4个师。我们马不停蹄地移师昭阳江边，12军作为“强的军”划归九兵团指挥，兵团司令宋时轮给我师规定的任务是突破加里山，切断洪川通向杨口的公路，配合27军围歼伪五师。

朝鲜三八线上大山纵横，加里山是群山中的主峰，海拔高1050.7m。侦察分队探明，山上的防御阵地在半月前就筑成了，敌人在我进击的15公里长的道路上已布下雷区。让李德生揪心的是，比地形更险恶的是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35师入朝时兵员有16000，经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穷追猛打，全师伤、亡、掉队3000多人，兵团要35师在24小时内拿下加里山主峰。

这是一场血拼。师参谋长张镰斧战前作出准确的预测，至少要用5000人的生命代价才能越过这道天堑。攻打加里山，35师的部署是，04团开路，03团攻山，05团阻击。李德生立下军令状：谁要是不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

师团有权就地处决失责的干部。

战场纪律是严酷的，巨大的战斗力也由此产生。你要往后看，是自己人的枪口；往前冲，是敌人的子弹。每个干部都知道自己面临生死，人人惊惧，拼死向前是最好的抉择。

二

1951年5月16日晚6时30分，35师涉过昭阳江向加里山接敌。从昭阳江边到加里山山脚，是一条山间小道，行程10公里，沿途地雷密布。04团是师的前锋，侦察连在前头清除敌人的警戒，工兵连紧跟其后排雷。敌人设置的雷品众多且隐蔽，踏雷、挂雷、绊雷，防不胜防。效率就是生命，发现疑点，就撒把炒面做标识。冲锋的战士在干部的吆喝下几乎都在小跑，地雷在他们脚下响起，硝烟起处，一个班炸光了，另一个班立马跟上去，一个连趴下了，接替的连队继续向前突击。鲜血染红了一路，尸体也摆满了一路。空中有强击机俯冲轰炸、扫射，地面上是千百发炮弹织成的一道道弹幕火墙，炸裂声在山间轰响，狂飞的弹片削光了两侧山坡上的树林，整个山沟是烟的天空，火的海洋。

我们医院在04团后面边跟进抢救伤员，百十号人全都上阵，我们包扎了二百多伤员。我的任务是登记伤员，带领挑夫班埋葬死者。沿途已牺牲了好几百人，我让挑夫班将死者顺到路边，给后续部队上来处理。

已是下午时分，敌侦察机发现了跑在我们头里的一个运送弹药的辎重连，炮弹如雨点般飞来，顿时，50多匹牲口和百余名驭手，在烟火覆盖的三百米地段上，被打得马嘶人叫。炮火刚稀落，我们的医护人员立刻奔过去抢救，存活的已是肢残腿断，气息奄奄。

医院投入的三个救护班是战前组织的，她们都是刚参军的女孩子，原服役各个团的宣传队，战争要求她们救死扶伤，都集中到了师医院，只经过几天的野战救护训练，就走向了弹光血影的战场。她们要为伤员清理伤口，注射破伤风疫苗，包扎或上夹板，虽不熟练，都做到了尽心尽责。

我的同行俞寒，不但要登记伤员，还担负着清理死者遗物的任务。凡担架抬来已无法再挽救的，俞寒就在死者身上搜寻遗物。经他搜出的物件都登记上死者的姓名、单位，卷成小包大包，交给担架队长转送团的组织部门。他工作细心周到让我感动。我说：“你太认真了”。他说：“他们都上天下地了，我的工作就

是让他们魂归故里。”

我正带领挑夫班搬运死者，一个老护士跑来呼唤我，说玛丽牺牲了，我的脑袋轰地一响。教导员要我去处理，我急忙领着两个挑夫，随老护士跑到一处干涸的水坑边，见到玛丽侧身躺在那里，头发散乱，面容惨白。老护士告诉说，玛丽在她一侧包扎一个炸掉左腿的驭手，血止住了，为了防止他再受到创伤，玛丽把昏迷的伤员背到低洼处，刚放下伤员，一发炮弹落到她身边的一块岩石上，她倒下了，再也没醒过来。我让两个挑夫把玛丽的尸体抬到一处山壁脚下让她安息。

俞寒听说玛丽牺牲，赶了过来，他在玛丽身上翻找了一阵，从颈脖上取下一条带十字架的金项链。他告诉我：“玛丽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牺牲的，她的献身是有颗仁慈的心，下葬要隆重些。”他的语气沉重。我马上让挑夫班长按规格挖坑，长两米，宽50公分，深50公分。我们抬起她的躯体，轻轻地放进坑底。俞寒不想让泥土污损她那张安静美丽的脸，找来些石块架在她的头部上面，然后才盖上土。一个圆圆的土堆垒成了，没有标志，没她的名字，她将永远躺在这块她不该来的土地上。

玛丽本姓李，是个大学生，父亲是一家银行的高级雇员，母亲是华侨富商的女儿。她背叛家庭走进革命阵营。她来到医院，特立独行，性格豪爽，一说话少不了 yes, no, 称呼战友前置词都带 miss, mister, 老兵说她是布尔乔亚，外号叫她玛丽。晚会上，她跳的百老汇的踢踏舞，姿势健美，她曾希望像邓肯一样，做个现代舞蹈家。来到医院后，她又想当南丁格尔。我喜欢她的热情奔放，劝她争取入团，她放声大笑着说：“我是个自由的小鸟，不会进你们笼子的。”

俞寒两眼含泪地说：这只小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她美好的年华，她本不该飞向战场。我也心生悲悯，视野模糊了，眼帘上仿佛垂下了一绺黑纱。

俞寒对待玛丽之死感情真挚，让我对他从心底生出好感。这么善良的人为什么不能入团？俞寒从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医院的，和我一样任职文化教员。他23岁，大学肄业，当过小学校长。我们相处才两个月，他举止庄重，待人和善，文化素养要高出我一头。入朝前，我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提出俞寒应入团。小组长说：“他入团的事由党支部来考虑。”我问：“为什么？”小组长说：“你就别再过问了。”我找到教导员，教导员回答：“他有历史问题拖累，当前又出现立场问题，不但不能考虑。而且你们对他还要有所警惕。”

俞寒和我聊过他的家，父亲当过伪保长，哥哥是国军的下级军官，去了台湾。教导员指的立场问题，是入朝前，全部队进行仇美教育，小组讨论会后，他和教导员有一番辩论。俞寒认为，三八线是国际条约界定的，金日成借边境纠纷大举进攻韩国，想一统江山，联合国出兵是有理由的，美国人不是侵略者。教导员辩不过，记下小账，要我们团小组对他提高警惕。进入战场后，他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的，找不到他有任何阶级异己行为。

三

天已暮色，我们进到加里山前的一条山沟里，院长决定在这里集中收容伤员。我在沟口点上盏风灯，插上根粗壮的树枝。树枝上挂了块有红十字的白布，担架队抬着伤员急急地来了，卸下了伤员又匆匆地离去。不到半个时辰，抬来的伤员已布满了沟。我和俞寒紧张地登记，只记姓名、单位、血型，昏迷的就划上×××。到午夜时分，我们已记下八百多。

伤员都躺在潮湿的草地上接受简单的、快速的救治。伤口疼痛难忍，有的放声大哭，有人在骂娘，还有打护士的。一个伤员在高喊：“快毙了我，我不想活了！”几个精神分裂的在唱歌，歌声凄厉，撕心裂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哀鸿遍野”。

在登记伤员时，我发现一个老兵是枪伤，子弹是从后背贯穿前胸的。我很惊异，这10公里的战斗，他们是在驱赶敌人的前哨，很少停下来和敌人持枪对垒，受伤的几乎全是弹片崩的。

我问：“你是怎么受伤的？”他还能说话，就是不吭声。

我追问：“是不是身后战士走火误伤的？”

他像是为了纠正我的说法，才吞吞吐吐地说：“是指导员打的。”

我骇然：“为什么指导员要打你？”

他说：“冲在头里的一连，没剩几个人了，营长要我们连接替一连快速前进。我们顶着飞机打、炮弹轰，勾着腰跑了几百米，我们连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班副在我前头，我见他弯下腰，在一个牺牲同志的脖子上抓起一把血往脸上抹，抹了几下，就一头栽进沟里，我也跟着副班长往沟里跳，指导员跑上来用枪指着，要我上来，我说起不来了，他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想腿肚子朝前，见鬼去吧！’顺手就给我一枪，我一躲闪，子弹打在背上。副班长一见，爬上沟又向前

跑，我就给担架抬来了。”

“指导员是在督战？”

他听我话中带有同情，告诉我：“我原在国民党干了三年，国民党的师、团都有督战队，他们在后面用枪逼着你冲锋，没想到解放军也这么干！”

我又问：“只有指导员一个人在督战？”

他说：“班、排有党员骨干监督，指导员带一个班跟在后面，谁要动作迟缓，就骂‘装熊啦，当心你的沙罐（指脑袋）。再不听，就是一枪，给你算了伙食账。”

我疑惑了，有人常说，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前仆后继，是阶级觉悟高。一个负伤的排长真诚地对我说，谁愿意找死？战争就是在鬼门关上跳舞，敌人的子弹没长眼，你想向后转，有人就用枪顶住你的腰，你要是向前冲，或许有条活路。排长说出一个老兵的生存哲学。

四

午夜，03团上来接替04团开始向加里山主峰攻击。经我和俞寒登记的1500多名伤员，给担架队陆续转移到后方兵站医院，我们又尾随03团上山收容。从山脚到山顶，是5公里的山路。

天黢黑，下着小雨，我们从一条大坡度的冲积沟向山上一步一点头地爬去，子弹在耳际“嗖嗖”地尖叫，炸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漫山是火链飞舞，弹光闪烁。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拉开了距离，女同胞们像登山队员一样，用一根长长的废电线相互牵引，她们背负大捆的夹板、绷带，艰难地行进在乱石中。我带领挑夫班在前头开路，他们的挑担都有七八十斤重，全是手术器械和布匹敷料之类的救护必需品。我一路都在提醒他们要谨慎小心，稍有闪失，野战医院就会缺失战地功能。

挑夫都是些身负刑惩之人，有的是开小差抓回来的，有的淫乱违纪，有报复伤人的，有说“反动”话的，他们发配到挑夫班，尽管是苦力，但比起战斗连队，他们就像进入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因此都感激天赐，干活卖力，也最好管理。

在夜色中行进，一路都是跌跌撞撞的，走着走着觉得脚下软绵绵的，我打开蒙着绿布的手电一看，震惊了，是自己人的尸体！我用手电扫了一下，沟里的尸体几乎个挨个，人叠人，面目狰狞，浑身血污，肢体扭曲。我要挑夫倍加小心，每迈一步，都尽量踏在尸体间的缝隙里，千万别踩着死者。尽管步步谨慎，还是

不断出现连挑子带人摔在死尸上的事。跟上来的女同胞不少是经历过战争的，见死者成堆，也惊愕得连连不断地发出“啊啊”声。

天已放亮了，我们还在无以计数的尸体中间跋涉，我的感情麻木了，迈着沉重的两腿，仿佛脚下不是死者，而是一块块石头，只是下意识地避开。好不容易在半坡上找到块平缓的草地，我让挑夫们放下挑子歇息，他们没有坐下，也没喝一口水，两只猩红的眼睛望着山下那一沟死者。那里有人还在呻吟，有人在蠕动，有人在摇动手臂，像在呼唤我们。此时，院长、医生、护士都在死尸堆里找活人包扎、注射、止血、整肢，我赶紧跟过去登记。伤员太多了，那些喘着粗气呻吟的，说不出话的，五个人我就写出一个正字。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满沟一片白色的星星点点，都是伤员身上绷带映衬的。活人和死者交集在一起的图景，让人惊心动魄。

担架队上来了，我无法告诉他们谁登记了，谁没有登记，时间就是生命，都让他们抬走。我正紧张地登记，突然在我侧方的山坡上，一声轰响，我抬眼望去，黑烟起处，有人在地上挣扎。我赶紧跑去一看，倒下的是护理员小黄，她从一块巨岩上背下伤员时，不幸踏响了地雷，左腿炸断了，医生很快过来用绷带在她断腿处扎住了正在射血的腿动脉。她昏过去了，两个护士托住她的身体。被她救助的战士身上还有枪、手榴弹，她竟然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把他背负了二三十米，她爆发出的能量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担架很快地抬走了她，我永远留下她那纤巧、活泼、美丽的身影。

我估量了一下，03团死者约一千多人。他们的攻击路线就是沿着这条冲积沟上山，死者密集在沟内，那一张张满是硝烟，眼珠突出，牙关紧咬，让人心悸的脸，像在迸发胸中的悔恨之情。教导员要我让挑夫们薅来茅草，撅来树枝，盖住他们的脸。教导员是抗日老兵，他知道，满山遍野的死者形象会影响后续部队的战斗力。

俞寒此时也跟来和我们一起忙活，他不是薅草盖尸体，而是从死者身上取下遗物，大都是些雨布和鞋袜，他集一起打成捆，放在路边，待收尸队上来带走。凡信件、纪念品或贵重金属，都放进他挎包，由他交给师的组织科。此刻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喝水，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过去，他让我坐在身边，从挎包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来，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是四寸的，上有一个站着的青年妇女，身边还有个五六岁的女孩，妇女一身短布衫，面容清秀，孩子穿着布背心、短裤。母子俩的表情孤寂，仿佛心中都纠结无限的痛苦。俞沉重地说：“这又是一家孤儿寡母。”他用手指了指四周的死者说：“这场战争下来，背时的千家万户，说不定其中还有你和我。”俞寒说着，从胸口袋摸出张二寸照片来交给我，说：“这是我的堂客和娃儿。”

我端详照片，俞寒夫人很俊美，花衬衣西裤，怀中抱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俞寒说：“拜托你了，要是我在寅时卯刻革命到底了，你就给她报个丧。”

我说：“我的命不比你大，都彼此关照。”“那就听上帝来安排。”

我们一直干到傍晚，盖了300多死者，医院又要行动了，只能放弃。后来听说死者的掩埋，是由军文工团的人来处理的。他们从舞台走上战场，背扛肩挑送粮送弹，埋死者、抬伤员都很尽心，安葬时，都要擦净死者的脸，还找来石头垫在死者的头下，让他们安详的走向天国。

五

中午时分，我们上到加里山的半山腰。03团团团长王西军，带着他指挥所的七八个人上到半山腰了，跟上来的15瓦电台在他身边摇响，他拿起话筒，蹲在一块巨石边放声呼叫，脸色铁青，他是背着十字架在打仗的。

五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他带先头营追击敌人，发现土耳其旅在汉江滩边宿营，王请示跟随他的师参谋长张镰斧：“打不打？”张说：“你自己定。”王不愿意血本无归地让自己的700人去拼杀6000人，眼睁睁地看到敌人睡一觉又跑了。12军政委李震大骂他畏葸不前，不敢去碰三流的兵，可耻！给他的处分是撤职留任。

这次李德生把他当拳头使，要他拿下加里山主峰，将功赎“罪”。

他也是心里窝着火在打仗的。他的团从午夜开始打到现在，已整整12小时，一营顶着子弹往上拱，打得只剩下70多人；三营接着攻，几乎是用一个班的生命去换得一个阵地。拼得生还的不足60人，二营跟在后面，还没投入战斗，就被飞机炮弹炸得伤亡近半。眼下要向山顶冲击，敌人在这里的设防更为严密，前有交通壕、铁丝网，后有盖沟、暗堡，火力交叉，配置有序。

日本有本朝鲜战争记事本，就记录加里山主阵地的工事设施，用了沙袋23.7万条，铁丝网385捆（每捆10米），铁桩6000根，地雷3955个，他们还把上

千株大树砍倒做成鹿砦，如一道天堑，怎么穿越？

战后，二营营长杨官保告诉我，他的营有个叫雷青山的战士，给炸断了腿，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为了给战友开辟条通路，他爬到一处高坎上顺势一滚，引爆了三颗雷，壮烈牺牲。我至今不信，战士的勇气我不会有任何的质疑，但是敌人设雷，最近距离也在5米以上，一颗雷就可以把你把躯体炸飞，要一个人的躯体开辟出一条通路，只能说是出于想象，让战士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

二营长是现场见证人，是否夸大史实，我无法再作考证，姑且记下这一壮举，当时最为真实的是，他们营已无法再前进一步，反给依托工事的敌人从各个角度形成的交错火力死死地压在沟里。王团长陷入绝境，要求李德生投入预备队，尽快地拿下加里山主峰阵地，否则前功尽弃。李却斩钉截铁向王西军下达死命令，你别指望谁来帮忙，把你的机关勤杂人员全拉上去！

李德生战斗的一生，几乎仗仗都是在死打硬拼。1937年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1940年的百团大战，李是769团的连长、营长，每仗都是身先士卒。1945年春，李已是太行二分区30团团长，他不用一枪一炮，带领81人的大刀队，半夜摸进正太铁路上的马坊据点，砍杀了80多个鬼子。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表扬了他的英勇无畏。

王西军此刻血冲脑门，在他身边的副团长张二胖，一把抓过话筒喊开了：“一号（李的战场职务代号）我是二胖，我上，拿不下加里山，提头见你！”副团长回过头，要二营长杨官保给他组织敢死队。二营长从六连挑出十几个老兵，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抓过一挺机枪，领着敢死队成散兵线冲了上去，他们边投弹边射击，二胖身边的警卫员倒下了，敢死队也给打的剩下几个人，还在拼死拼活往山上冲击。二营长杨官保怕副团长有失，让六连二排也跟上去，又是一阵猛冲猛打，进了主峰脚下时只剩下七个人。

主峰突兀如帽，高约10米，四周是悬崖绝壁，二胖用机枪压住敌人侧面射来的火力，掩护6个战士攀缘绝壁。战士搭起人梯，把刺刀插进石缝，相互提携支撑，一步步地攀登，终于爬上了峰顶。这里只有一个机枪工事，敌人想不到我军会从绝壁爬上来，正一个劲地闷着头向山下射击，战士抛出两颗手雷，炸掉了敌人的机枪，占领了加里山的主峰阵地，时间是17日下午3时10分，按兵团的规定提前了两个小时。

我还要交代张二胖的一个小故事。1949年11月27日，在解放重庆的南温泉战斗中，他率二营也是抱着挺机枪冲在头里，二营战死三百多人，才打开了进入重庆的大门，重庆人在南温泉立碑纪念死者，张二胖在死难烈士碑上列为第一名。2000年我主持写12军军史时，重庆巴南区文史馆来人访问，才把死人改成了活人。1960年代，二胖是从27军副军长任上退下来的。

03团打下加里山后，王团长把残兵们迅速组成一个战斗集体，营长当排长，连长当班长，在他率领下，如下山虎般打退了迎上来阻击的法国营，当晚就占领了洪杨公路两侧，还在公路上埋下了地雷，等待后撤的敌人。

王团长完成了战斗部署，又有出色的战场发挥，军党委发出电令，撤销了对他撤职留任的处分决定。

六

05团是预备队，它的任务是在切断的洪杨公路阻截逃敌。从加里山垭口到洪杨公路有3公里，05团翻山后，进入一条叫茅老谷的深沟隐蔽待敌。18日凌晨，美国人的侦察机发现了他们这么大的部队在集结，如获至宝，用了16个炮兵营的火力狂轰，炮弹像蝗虫般飞来。霎时间，茅老谷火焰迸射，雷鸣般的炸裂声响彻四野。美国人的战斗是立体的，还派出7个架次的强击机投入攻击，扔下的新武器是空中开花的空爆弹，和能烧毁200平米地物的凝固汽油弹，浓浓的烟团在空中滚卷，石块伴着肢体在烟雾中上下翻飞。韩国的军史记载了这一战例，说美军发射炮弹一万二千发，飞机投下的炸弹有一百吨，创造了自二战以来战场上弹着点最大密度的轰击纪录。

到中午时分，密集的炮火稀松下来，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出动奔向山沟，百十号人散布在这条3000多米的冲积沟中，见一个伤者就包扎一个，跟来的担架队抬上就走。我带领挑夫班也参加抢救，我和俞寒还收拣残肢断臂、人肉骨头，用牺牲战士身上的雨布包好，选择土坑石缝填埋。俞寒心细认真，每当他埋下一处骨肉时，都要找块石头写上“烈士遗骨”。

敌人的炮时打时停，炮火下，人人命悬一线，都在拼着性命忙碌抢救。绷带没有了，就撕下自己的衣袖给伤员包扎，夹板没有了，就折断树枝代替。在这里，平均每平米的土地上，就要落下两发炮弹，死者多半已血肉横飞，很难见到一具完整的尸体。一个护士正给一个伤员捆扎断臂的手臂，突然扑哧一声，一个肢体

从空中落下来，砸在她身边，她惊叫一声，又给伤员继续捆扎。我过去一看，是一条人腿，血糊糊的腿肌还在跳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的生命在最后的挣扎，我把它拾起来放进一条石缝中。

我看到俞寒在对面的沟边，正把一个胸部受伤的战士从一道石穴中奋力地拽出来，很快给他做了包扎，伤员大概出于感激之情，忍着疼痛，用颤抖的手把系在腰间的一双新胶鞋解下来递给俞寒，俞寒接过鞋，没说什么，迅速地把伤员脚上的那双旧鞋脱下，套上了新鞋。

正在此时，一个护士奔过来叫住我，要我去帮助她做伤员的工作，我叫过来俞寒，她把我俩带到一个伤员跟前，伤员炸断的一只小腿已结扎了，躺在弹坑里还抱住一具尸体哭泣。护士告诉我，死者是他的叔伯兄弟，一起参军的，哥俩曾有约，生不离，死不别。他要求我们把他和死者一起抬下战场，找个地方安葬，有朝一日他还要来把尸骨取回四川老家去。担架员不干，放声吼开了：“活下来的都弄不走，还要我们抬牺牲的，太不像话了！”俞寒劝导说，他是个新兵，亲情比自己的生死还重要。他说服了担架员，抬走了战士和他死去的堂弟。

军的担架营也出动了，和师团的担架连一起出没在弹烟中，劳累了一天，两百副担架抬走了一千多伤员，俞寒那张灰色的脸舒展了一些，庆幸地说，他们算是活下来了，残了，就回家颐养天年吧。

俞寒富有人性的话语，在我心底泛起一股热浪。

茅老谷山沟里丢下一千多具尸体，生命在这里只是一个数字，他们大多没名没姓，更不知籍贯在哪里，他们中多数是从国民党俘虏来的，他们生命终止了，只是在连队的花名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两侧青山埋下了他们的白骨，也埋下了人们的记忆，后人会认为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吗？

12军政委李震来到现场看了，他流着泪说：以前我们常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没想就在我们脚下发生了。

李震是北大学生，1938年入伍，是我军杰出的政工干部。他告诉我，12军的连以上干部1500多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有的还了解其性格特征。我曾和李震有过一次长谈，他坚信五次战役是光辉的战例，对毛泽东御敌于国门之外更是赞赏。我为他遗憾的是，文革中，他当了公安部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他仁厚的“失责”，让毛泽东索走了魂魄——那是1971年，毛泽东获得一份揭发陈

伯达“托派”的材料，让谢富治交给李震立案侦查。李震把它锁到文件柜里。李的秘书告诉我，这份揭发材料都是些不实之词，李很正直，认为陈伯达即使罪该万死，也不能给他泼污水，以为拖一拖就了事。哪知，毛久等无消息，大发了雷霆。李吓得胆战心惊，没两天，就自缢在公安部的地下室里，中共中央发出通报，说李“畏罪自绝于人民”。

七

18日上午，美2师23团和38团的大队人马从华川退下来，他们以为把我阻截部队一顿狂轰滥炸就可以夺路逃命，用了30辆坦克开路，引领250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向南突围。一路机声隆隆，尘烟滚滚，刚进入我在洪杨公路大小平川的阻击阵地，03团班长吴建德突发3发无后坐力炮弹，击毁了最前面的3辆坦克，接着05团战士梅永红，用手雷打掉跟进的3辆坦克。敌人车辆全给堵下了，车上慌乱的美军纷纷跳车逃命，军官用旗语和哨音指挥他们奔向南山，在那里竟没有我们的一兵一卒阻击。按兵团规定，南山的堵截应由27军担任，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给敌人网开了一面。35师堵住了洪杨公路，可全师战力耗损的剩下已不足5000人，只能分散地守住现有阵地，用机枪小炮乱打一气，眼看敌人像放羊一样向山上奔命。我们只打死敌人400多，俘虏130多人，放跑了5000多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出新闻，说我志愿军某部在大小平川围歼了美2师5600多人。这个放大十倍的成果，刚好是我们师的伤亡数字，一场巨大的丧讯变成了盛大的喜讯。

毛泽东和彭德怀有个共同的心结，都想成建制的消灭敌人，一张口就要吃掉人家三至五个师，结果不但没有如愿，我军的攻击部队反遭到重大的伤亡。本应歇手补充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彭总却以个人意志使我军遭到更大的挫败，他令移师中线的，已疲惫不堪的六个军全线向南出击。我们师血染加里山之后，元气大伤也得遵命。

李德生收拢残兵，组成的一支三千多人的突击队，挥师穷追到横城。美国人见我已是强弓末弩，把他们早已准备好的5个快速纵队同时撒出来，从我军回撤的军与军之间的间隙切入，抄到我后方，切断了我军的退路。此时，我军队形大乱，指挥失控，师团各自慌不择路地逃生，我们师穿沟越涧，爬山过岭，跑了三天三夜，终于奔出了包围圈。60军180师陷入了美国人的重围，惊慌失措的师

长郑其贵砸了电台，扔下了部队带上13个人跑了，全师7200人成了俘虏兵。师代政委吴成德脱逃时，他带了33人跑错了方向，只好在南朝鲜打游击，一年后还是给敌人捉了个活的。我华川的兵站医院收容的4600个伤员，也给美国人连锅端走。

五次战役经历50天，我军伤亡86000人，被俘15000人，溃退到三八线以北。

八

1970年初，王西军从江苏省军区副司令的职务刚退下来，我到南京北固山军休所去造访他。提起五次战役，他依然愤愤不平：“战争就是拼命，拼到什么程度？在国内战争，打大杨湖，一个连只剩下5个人，都望着一锅米饭流泪，最后我们纵队还是吃掉了赵锡田的整三师。打汤阴，我的营全躺在城墙的突破口上，我哭了。我们虽然牺牲多，获得的胜利果实是围歼了孙殿英的八千人。当年，攻加里山的危急时刻，我向李德生要求支持一把都不能，我们缺粮、缺弹，没炮火支援，硬是用三千人的生命堆到了山顶，守敌仅是一个营，打死的敌人不到十人。局部战争应赢得什么，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拼出血本要有所得，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敌我伤亡比例是1：300。这在我军战史上是沉痛的一笔，我无法向死者交代。”

老团长已远离战争，远离他在军队的高位，也不敬畏已是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王能在暮年坦诚的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令我感佩。

我转告了李德生，他诚恳的自责：“我最大的错误，不该在进攻、出击时，只选了条独路。我们不懂现代化的战争，美国人制造了火路、火墙、火海，我们还是用老八路的战术应对，5000人的伤亡我有最大的责任。”

我为这场战争的责任作一补充：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挑起的，这是一场不义之战，中国根本不该打这场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战争。

九

五次战役侥幸生还，我们的命运又安排到了没有枪炮声的战场。部队在谷山郡休整，从机关到基层开展了一场阶级队伍的清理。凡国民党起义的排、连、营干部，大都给遣送回国“另行分配”。我们这帮在重庆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也要

查出身、查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直系亲属被斗被镇压的，被清出了 600 多人，这些人也通通地打发回原籍。

我有两位熟识的朋友也在此列，一位是军医老李，他原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最初，我们要他到野战医院来，是看中他的人品优秀，手术高明。在五次战役，他全副身心都投入手术台上，晕倒了，浇浇冷水，又连轴转。他私下对我说，是金日成在 6 月 25 日打响了第一枪的，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用错了地方。另一位是俞寒，清除他的主要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分队长，我们的组织部门把他列为反动党团的骨干。

俞寒临行前，我和他有一次交谈。

“您是怎么搞起的嘛？”我为他惋惜，“年纪轻轻的，政治上就靠拢国民党。”

“我不是学生娃儿，我是校长，人是群居的高级动物，我要在社会上立足。”

“您非得要参加反动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反动组织？共产党不也敬奉过三民主义吗？我信仰它有什么不可以？国共两党对立了，打起来了，就说人家的组织是反动的，这通情达理吗？”我无法和他争辩，他只能脱下军装回家了。

他交给我一张已上交烈士遗物的清单，和他登记的 1000 多伤员的名册。文字工整清晰。他的走，给我留下了解不开的心结。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战场上兢兢业业，就因为出身背负十字架，陷入了不可翻越的深渊。

文革中，我去他家乡看望过他，他是街道民办小学的教师，有了儿女，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很清苦。公安还不断上门监护他的行迹。他见了我，表示无怨无悔，还感激上苍没有把他的命留在朝鲜战场。他宽容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活下来就是大幸。

我还去过一些烈属的家。当年，战争没结束，他们的门前挂上“烈属之家”的牌子，逢年过节，街道干部，三亲六戚都来慰问。虽失去亲人仍感到光彩生门户。这些年人们都淡忘了，门前也冷清了，晚辈们不知烈属是何物。一位烈士的老父亲从箱底翻出发黄的“烈士证书”给我看，说，这还有什么用？！

有被俘遣返回来的，怎么也不愿见我。在洪杨公路最先打掉美国人 3 辆坦克的吴建德，他是受伤后被俘的。他的一等功被取消，开除了团籍，回乡后一直在扛锄头。一个越战被俘的美国军人被释放后，回国还能参加总统选举，我们为什

么连起码的公民权利都被剥夺？

我还看望了小黄，她在加里山上被炸断腿后，复员回家，靠残疾金无法生活，在一家纸盒厂做工，挣些补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料，她最大的愿望是想换一张轮椅、能折叠的，她的住房只有11平米，希望扩大一点空间。

死者长已矣，生者有何求？我看到大批复转军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当年，我等小知识分子在重庆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有9600多人，除死伤、整治清理的之外，转到地方的都是有功劳的人，至今他们的养老金都在1600—2400之间，吃饭、穿衣、看病，度日艰辛。12军政治部一位秘书，文革结束转业一家造船厂，工资待遇450元，要靠战友月月接济。❷

【人物】

为党国立“新统”

——冯友兰散记

郭罗基

冯友兰¹ 有一副自嘲联：

终身教研两依据

一生文章半检查²

上联“终身教研两依据”，符合实际；下联“一生文章半检查”，不大确切。1949年（54岁）以前的大半生，冯友兰从来没有作过检查，1949年以后的小半生，确是经常作检查。至多只能说“半生文章多检查”。值得追问的是，前半生

¹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1990年11月26日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冯家为祁仪镇望族首富。祖父有田一千五百多亩，家中常开二三十人的饭席。冯父台异连中秀才、举人，殿试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一百九十三名即末名进士，授湖北崇阳县知县。冯友兰初读于族中私塾，背诵古文，练就童子功。少年时代，就读于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武昌中华学校。1912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转文科哲学门，学中国哲学。1918年毕业。1919年12月，考上公费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² 冯友兰致山西农民车恒茂信中说。见冯勤学《鸿雁传谊六十年》一文，引自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第277页。

从来不作检查的人何以变到后半生经常作检查？客观上，环境变了；主观上，冯友兰的人生追求没有变，经常作检查还是为了实现从来不作检查的抱负。

冯友兰自称，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照着说”和“接着说”。写《中国哲学史》是“照着说”，写“贞元六书”¹是“接着说”。照着古人的哲学去说，说完了，就接着说自己的哲学。“贞元六书”是冯友兰的接着程朱理学说，故曰“新理学”。

“新理学”的体系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乃帝王南面之术。冯友兰的这一套学问，必须而且只能“货与帝王家”。“贞元六书”中的《新世训》讲新生活的方法论，最后一节落脚到《应帝王》。冯友兰的一生都在“应帝王”。如果不是时势变易，他必将按家族的传统、跟着父辈的脚印，循科举而向帝王的殿堂攀登。“应帝王”是他人生的历史起点，也是他思想的逻辑起点；不过前半生是应蒋帝王，后半生是应毛帝王。说他“一生文章应帝王”，倒是确切的。应了蒋帝王，再应毛帝王，总是不大自然。从来不作检查到经常作检查，实为以迎合、奉承、紧跟消除这种不自然。洞悉“应帝王”，才能理解冯友兰的为人和为学；洞悉不同的应帝王，才能理解冯友兰的不作检查和常作检查。

庄子的“应帝王”和冯友兰的“应帝王”

“应帝王”本是《庄子》内篇第七的篇名，庄子本人未有解释何为“应帝王”，只是讲了六则寓言。窥其意，主张随任自然，无为而治。庄子身处战国的乱世，以为世人太有为而多事是致乱之源，向往上古的自然状态，继承老子的思想，提倡无为。18世纪西方的启蒙学者，也以人类的自然状态作为推论的前提。看来，自然状态是一个方便的假设。但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启蒙学者从自然状态引出积极有为的结论，老庄从自然状态引出消极无为的结论。庄子的“应帝王”命题

¹ 所谓“贞元六书”是冯友兰的“贞元之际所著书”。何谓“贞元”？冯友兰自谓：“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69页。）何谓“贞下起元”？还是不明白。“贞元”语出《周易》。“干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注《易》者谓此为春夏秋冬之序。所以“贞元之际”，直白地说就是冬春之际，“贞下起元”就是冬去春来。冯友兰喻以抗战时期的中国将冬去春来，而他的著作就是这个冬去春来时代的哲学。冯友兰曾说，金岳霖的本事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他自己的本事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大体如此，亦非尽然。“贞元之际”、“贞下起元”、“贞元六书”就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以致他本人和别人需要一再作注。金岳霖是从简单开始，进行逻辑推演，越说越复杂。冯友兰的“贞元之际”不过是文字游戏，没有逻辑推演，完全是多余的复杂。

包含着内在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无为而治，就不需要帝王了；当了帝王就要统治非帝王，不可能无为了。庄子的主张虽是为无为，他汲汲于向一切人从平民到帝王推销无为却是有为；以有为促无为，这又是一个矛盾。古今中外的哲学，往往具有理论自身中的矛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实践的哲学”，这就没有矛盾了。

“应帝王”，郭象注：“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在庄子那里，“应帝王”的含义是“应为帝王”、“应然帝王”。在别人看来，他是教人怎样做帝王，为帝王出主意。因此“应帝王”的另一层含义是“应承帝王”、“应对帝王”。庄子“应帝王”的内容是消极的，没有一个帝王听他的；“应帝王”的命题却转化为积极的，应帝王之邀或响应帝王、呼应帝王以谋事。冯友兰极为推崇董仲舒，他说：“董仲舒是一代大师，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回答了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可是像董仲舒这样的大师，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¹ 董仲舒“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回答了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应帝王”的样板。

冯友兰在阐述新生活方法论的《新世训》中归结到“应帝王”，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为之提供方法论。这就是“应承帝王”、“应对帝王”；另一方面，又从一般人的生活方法，谈到“首领”的生活方法，为“首领之道”作出几点规定。这就是“应为帝王”、“应然帝王”。舒芜说：“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在。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²

有人回应冯友兰的批评者、为“应帝王”辩护。冯友兰的女儿冯鍾璞（宗璞）³ 说：“最后《应帝王》一章讲领导艺术，讲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我就觉得 CEO 们都应该读读这篇文章。”。她还说：“‘贞元六书’中《新原人》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新事论》是讲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新世训》是

¹ 《冯友兰自述》第 6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² 舒芜致谢泳信，见谢泳《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读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³ 冯鍾璞（宗璞）1928 年生于北京。抗战爆发后，随父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6 年回北京，投考清华大学，未取，（1946 年，有三个清华子弟报考清华落榜：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鍾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这三个人中有人与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清华的严谨校风以及这三位清华首脑为人的清正作风，一时传为美谈。）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文艺刊物编辑。70 年代，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她的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集《紫藤萝瀑布》等。

它们中间的过渡。单从逻辑上讲，它的结尾也自然是《应帝王》。”¹ 什么“逻辑”？没有讲清楚。那么，为什么不标为“领导艺术”或“管理艺术”？这就不懂冯友兰的苦心了。标为“领导艺术”或“管理艺术”，模糊了服务对象，是“应帝王”，不是“应CEO”，也不是“应部长、厅长、局长等领导层”；那么，为什么文中又不说“帝王”而说“现代首领”了呢？说“现代首领”才有现实意义，说“帝王”别人还会以为是说给古人听的呢。冯友兰的“应帝王”是继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说到“现代首领”是在传统中别开生面。

有人引用余英时的论述：“余英时先生认为，冯友兰思想的最深处始终有一种向‘帝王’进言的意识。这只要读一读他的《新世训》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余英时讲，冯友兰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者至少要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纵观冯友兰的一生，我们不得不承认余英时的这一评价是大体公允的。……从迎合‘总裁’，到歌颂主席，乃至媚谄女皇，冯友兰一生不脱‘应帝王’情结。”² 余英时先生是不是看走了眼，怎么没有从《应帝王》中看到“领导艺术”、CEO必读？

引述余英时是否有误？那么，且看他本人是怎样说的：

我认为他（冯友兰）的思想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只要读一读《新世训》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1949年他上书自效，却得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答覆，虽心中“有一点反感”，得到御筭则引为无上光荣。1957年招宴中南海，不幸未得机会与毛多说话。毛送客人出大门，人人都去了，只有他站在车门旁不舍得走，有所期待。卫士提醒毛，“还有一个客人”，毛转头招手告别。显然使他失望。以后与毛有两次“拉手”谈话的亲切场面，再加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从旁凑兴，夸奖一二语，他简直喜不自胜，又写诗，又写对联。我认为这都是向帝王进言的潜意识从中作祟。³

¹ 宗璞《给古人少许公平》，冯友兰研究所版权所有。

² 史飞翔《余英时评冯友兰犹在“功利境界”》，阳江新闻网，2013-01-06

³ 《余英时访谈录》第81页，中华书局，2012年。

海外新儒家刘述先评冯友兰，也说：“冯氏……的致命伤在于他有很强的‘应帝王’的一面……这一方面的习性到大陆易手以后，乃发出极大的负面作用。”刘氏认为冯已不在当代新儒家之列，因为他早就否定了自己从前的观点。¹

冯友兰的“应帝王”，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说是唯一的，也是很引人注意的。

“应帝王”和立“新统”

冯友兰虽喝过洋墨水、戴过博士帽，但从外表到内心依然是传统的中国文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中国哲学”。² 中国人到美国学中国哲学，不免滑稽。他的导师杜威，在中国哲学方面还不如他。除了拿学位的方便，也可见其对传统的固守。

传统的中国文人名曰“士”。士，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与权势对抗的士，极少数，“士可杀，不可辱”；另一种就是极大多数被毛泽东看透了附在“皮”上之“毛”的士。“皮毛士”是官僚体制的后备军，他们的最大抱负是为“帝王师”。冯友兰在“三反”运动中自己交待：“开始学哲学时，就抱着要作‘帝王师’的思想。”余英时说冯友兰想做“王者师”，没错。冯友兰说：“像董仲舒这样的大师，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他是想当“几个”中的一个的。历史上的“皮毛士”，睥睨当世，自命清高，想当“帝王师”的，弄不好反为帝王所杀。冯友兰的精明就在于欲为帝王师，必先师帝王。董仲舒之所以能“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回答了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在于他摸透了汉武帝的心思。冯友兰想必研究过“天人三策”。董仲舒的“策对”，无非是将汉武帝的“策问”中所蕴涵的思想加以发扬光大，以“应帝王”。故，成功的“应帝王”，如董仲舒，即师帝王的帝王师。蒋介石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的内容，无非固守传统，加点资本主义，即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冯友兰的“应帝王”之术，就在于首先师蒋帝王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半殖民地意识形态，以“贞元六书”进行学术包装，恣意发挥，叫卖于市，求为“帝王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即“贞下起元之命运”；

¹ 刘述先《平心论冯友兰》，《当代》（台北）“最富争议的人物：冯友兰”专辑，1989年4月。

² 中国学人到了西方，一般都是专注于西学。例如，余英时说，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和读博士学位时，“我当时想的是，我既然到国外来了，那又何必念中国书呢。所以我想先多念一些西方的书，至于怎样和中国学问联系在一起，那可以等我回香港以后再慢慢消化。”（《余英时访谈录》第125页，中华书局，2012年）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用蒋介石的概念来说，即以哲学论证的“中国之命运”。冯友兰曾在重庆和西安的集中营讲课，西安集中营只许看两本书，一本是《蒋介石言论集》，另一本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

冯友兰有一副常常提起、自鸣得意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表达了政治抱负，下联表达了哲学抱负；两者结合，就是为今上立“新统”。其中一个“辅”字，道尽冯友兰的心志，表达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立思想上的“道统”，以维护、论证、引领政治上的“正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维系几千年历史绵延的儒家学说是千年道统。时至20世纪，冯友兰还说：“每一种社会，都有他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例如中国秦汉以后的孔子……。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都需要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¹冯友兰枉为美国留学生，你在美国看到、听到以一种哲学作为“道统”的吗？美国流行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决非“道统”。立道统完全是中国特色。作为新儒家的冯友兰，致力于将千年道统的老店新开张，故曰“新统”。接着千年道统立“新统”，就是在他自己“接着说”之后要别人“跟着说”。他的《新原道》的最后归结为“新统”；所谓“新统”，冯友兰自云：“它所讲的，还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²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看了以后说：“写得倒是好，只是把事情说得太穿了。”就是说得太露骨了。

冯友兰“应帝王”的全部事业就是皓首穷经制作内圣外王的“新统”。如果蒋介石的正统延续下去，冯友兰很可能成为历史上“几个”董仲舒中的一个。不幸，蒋介石的正统断裂，而冯友兰又初心不改，因此就要应不同的帝王。

毛泽东既是领袖又是导师，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兼有“君”、“师”的地位，集正统与道统于一身。他的正统来源于革命，恰如成汤“永革天命”，不需要继承历史上的正统。因此，也不能利用历史上为正统服务的道统。冯友兰是看清楚的，但立“新统”的痴心不改，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将“新理学”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以期兜售“新统”。

¹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² 冯友兰《新原道》第123页，1944年第1版。

在冯友兰逝世以后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引用张载语，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说冯友兰的 95 岁一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完全不对。他是为党国立“新统”，先是为国民党的党国，后来为共产党的党国。

未成“帝王师”，沦为“帝王奴”

冯友兰应蒋帝王较为得手。

1934 年，冯友兰趁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之际，申请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得出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¹ 他出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游学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到过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进行对比，心中似乎有所触动。他根据自己的见闻作了两次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两次演讲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官方的注意。11 月 28 日，他被宪兵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带上手铐，押送保定行辕。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连鲁迅都慨叹：“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² 迫于全国民主力量的声势，

1963 年 11 月，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成员。平时从未见到冯友兰露出这样灿烂的笑容。³

冯被关押、审讯一天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发电报：“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从此冯友兰吓破了胆，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次年当选为 1935 年召

¹ 《冯友兰自述》第 7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² 鲁迅致杨霁云，《鲁迅书信集》下卷，695 页。鲁迅说，对于“安分守己”的文人如冯友兰，“且要被逮”，而“推知其它”，其它不“安分守己”的文人如何？那就是李公朴、闻一多，则被暗杀、吃枪子了。《余英时访谈录》中有言：“1946 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当时出现了一副十分讽刺性的对联：‘天下是老子打来，谁教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江山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第 83 页，中华书局，2012 年。）现在那些没有经历过民国、少不更事的人鼓吹“回到民国”，你们先准备好，是愿意享受“安分守己”的待遇还是不“安分守己”的待遇？

³ 图片采自《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2—2012》。毛的背后是周扬，与冯并列的是刘大杰（文学史家）、周予同（历史学家）。冯撰有对联一副：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修、反。

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以后，他又以此炫耀自己“戴过手铐”，还有“进步的一面”，据说还背上了“进步包袱”（见下文《三，检讨标兵》）。

1945年，他又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坐在蒋帝王身旁。蒋帝王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庶几为“帝王师”矣。蒋介石请他吃饭，还说：“大会要选你为中央委员。”冯表示：“愿为青年导师，当了中央委员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他意在“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讳言“帝王师”，只说“青年导师”。

毛帝王不大好伺候，冯友兰只好曲线“应帝王”。世人不知，检讨、表态是在外部的压力下，被动中争取主动，乃曲线“应帝王”的一种手段。冯友兰的女儿冯鍾璞（宗璞）说，她的父亲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检讨最多的一个。她的父亲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主动地、积极地，因而也是适时地、频繁地作检讨的多产作家。但她没有说明为什么？果然有效，“文化大革命”中，冯友兰就靠检讨、表态改变了命运，在这众人受难、国运幽忧的时期，却是冯友兰声名显赫的岁月；不过没有当上“帝王师”，而是沦为“帝王奴”。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将冯友兰的一生划三个时期：1949年以前是确立自我的时期，1949至1976年是丧失自我的时期，1977年以后是回归自我的时期。其实，1949年至1976年的冯友兰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应帝王”，不是丧失自我，恰好是顽强地表现自我。有人评论：“同情冯氏的论者或不免将第二时期之冯友兰说成不得已或被迫，因此，此一时期之冯友兰，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假’的冯友兰。其实，1949-1976是冯友兰求生哲学与‘应帝王’哲学应用得最彻底的一段时期，他把哲学和历史真正当做游戏和工具。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一时期之冯友兰，反成了最‘真’的冯友兰。”¹

还有人为冯友兰进一步挖掘“应帝王”的思想根源。袁伟时指出：“冯先生的错误就思想根源而言，主要有三：一，国家主义，跳不出民族洞穴。二，迷信领袖。三，名利思想。这些应该引以为训。”²不过，冯友兰的“国家主义”不是争取近代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是坚持王朝政治的正统。他的“迷信领袖”与同

¹ 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九州出版社，2013年4月。

² 袁伟时《汤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和我的私信风波》，2013年6月3日发表在《腾讯·大家》。

时代人有所不同，而是帝王崇拜在领袖身上的投射。他的“名利思想”也不是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强烈的中国传统的功名追求。

“中体西用”乃根本

冯友兰的为人和为学，与时代的关系，他自己在检讨（见下文《三，检讨标兵》）中说，他的哲学体系“反映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思想。在清朝末年，有洋务派买办官僚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蒋匪的《中国之命运》所讲的就是这种思想，封建道德加资本主义工业化（实际是殖民地化）。我的那几本书，也基本是发展中国固有的东西，即封建的东西，鼓吹资本主义工业化。”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冯友兰的“新理学”以至一代新儒家，都是“中体西用”，这就说到根本之点了。

中国共产党批判了蒋介石，也批判了冯友兰、新儒家，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何尝不是“中体西用”？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为体，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为用。几千年来，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几度轮回，走到尽头了。19世纪，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西用”基督教，建立“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西用”马克思主义，成功了。但夺取了全国政权，还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不过是家天下演变为“党天下”。农民起义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即秦始皇为体，马克思为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中体西用”，党国体制不变，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为我所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为体，“社会主义”为用。社会主义本是 INTERNATIONAL 的事业，标榜“中国特色”，否定了 INTERNATIONAL，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早先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也是。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人类，不是为了救国家。“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用，救中国之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一开始就传歪了。外来的好东西，传到中国就走样、变调、失色，因为遇到了“中体西用”。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还是因为“中体西用”。中国虽加入了 WTO，仍然是党国体制为体，市场经济为用。

由于中国传统的悠久，历史惯性的强大，“中学”在迎合和吸收“西学”时，难以摆脱传统、逃逸惯性。在一定时期内，免不了“中体西用”。最初，冯桂芬¹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校邠庐抗议》）。后来，多人、多次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²的《劝学篇》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了系统论述，作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最初提出，是在封闭、守旧的社会中为西学争一席之地，具有进步意义。但在西学传入之后，固守“中学为体”，就成为保守的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自序引张靖达的话说：“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中国学习西方“遗其体而求其用”，是买椟还珠，所以总也学不像。郑观应评：“诚中的之论也。”总之，“中体西用”在事实上是一时难以避免的，但作为方针是错误的。如果把它作为一定时期的历史的描述就没错了；而方针正是要跨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步入世界文明大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体”、“用”割裂。800年前的朱熹就知道：任何一物均有体用，无无用之体，亦无无体之用。体必有用，用必附体。“中学为体”是拒绝变体，“西学为用”是用不入体。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加入全球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正确的方针应是“体用结合，中西融合”。

19世纪中叶，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方针是“和洋折衷”。在和和文化（即日本文化）的基础上吸收

¹ 冯桂芬（1809年—1874年），苏州府吴县木渎镇人，字林一，号景亭、晚号邓尉山人。冯桂芬出身于富贵家庭。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是林则徐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于南京建都，冯桂芬奉命在南京附近的苏州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冯桂芬逃往上海，继续参加由江浙官绅与英、法、美等国领事组成的全防局。1862年以后参与李鸿章的淮军，与太平军对抗。晚年在金陵、上海、苏州等地书院讲学，从事著述。他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建议，为洋务运动的拥护者。著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

² 张之洞（1837—1909），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生于贵州兴义府。咸丰二年（1852年）16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27岁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创业甚多。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广雅书院等。工业上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著述收入《张文襄公全集》。

洋文化；以洋文化改造和文化。半个世纪之后，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依然是亚洲国家，但在文明上已步入欧美先进国家之列。中日历史的对照，可使国人惊醒。

1894 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归结为：“一方代表西欧文明，一方要保护东亚的旧习，……是西欧的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¹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东亚旧文明”的失败，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虽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破产，未经彻底清算，遗祸犹在。❏

【读片与读书】

《不夜城》

——爱国主义与自食其力

启之

在《不夜城》（江南，1957）之前，至少有 3 部电影写到了资本家。最早问世的是吴祖光编导的《红旗歌》（东影，1950），故事也发生在纺织厂，其中的资本家平时压榨工人，上海解放前夕，卷走工人的工资，逃往香港。此后是沈浮编导的《纺花曲》（昆仑，1953），其中的资本家也是拖欠工资，抽逃资金，弃厂逃港。结果在香港活不下去，又回到上海，看到工厂生产蒸蒸日上，深受教育。第三部影片《三年》（上影，1954）中的资本家狡兔两窟，关掉上海的纱厂，把资金、原料抽逃到香港。当上海厂恢复生产，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又回到上海，表面上伪装进步，背地里投机倒把。五反运动来了，他的“五毒”行为被揭发。

《不夜城》中的张伯韩，与上述三个资本家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剥削者，都不关心工人的死活，都有“五毒”行为。不同的是，张伯韩是个有专长，有事业心，有个人抱负的实业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爱国者。影片通过这个人物的转变，告诉人们，什么是爱国，应该爱什么国，怎么爱国。

—

故事从 1935 年开始，年轻的张伯韩从英国留学归来，带着实业救国的雄心，

¹ 陆奥宗光《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投身到上海纺织工业大发展的洪流之中。张伯韩刚回来，日本资本就找上门来——买办宗贻春告诉他，日本人看上了他们的“爱国牌”，要出高价买下，条件是把大光明的招牌摘下来。以后张家不必办厂，只须给日本做批发就可以发大财。

张伯韩断然拒绝。宗贻春警告他：跟日本人硬碰，要吃亏的呀！父亲张耀堂忧心重重：日本人看中了，这就算是掐上咱们的脖子了。张伯韩不信邪。他开导父亲：“日本人为什么要买咱们这个牌子，爱国牌为什么吃香，中国人要用国货，这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厂，只要我们能自产自销，就能跟外国人竞争。”像当年许多企业家一样，张伯韩是爱国主义者，他要用自己的专业和管理知识，提升中国纺织业的地位。

经过十余年的打拼，张伯韩把父亲留下的，代人加工的里弄小厂，变成了上海纺织业的巨头。实业救国的梦似乎变成了现实。然而，日本投降了，国共开战，政经动荡，原材料匮乏，产品无销路，工资开不出来，张伯韩不得不求助买办宗贻春，购买美国的棉花。宗贻春反问他，这对于爱国牌不大合适吧？此时的张伯韩保住厂子就行，已经顾不上爱国不爱国了。

解放了，濒临倒闭的大光明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工人的爱护下，订单纷至沓来，生产蒸蒸日上。张伯韩成了上海同业的龙头老大。逃到香港的妹夫凌大年一家六口，在香港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回到上海恳求他收留。在同行聚会上，踌躇满志的张伯韩，举杯祝贺：为我们事业的黄金时代干杯！

《不夜城》用这些新旧对比，传递了四个明确的信息：第一，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但是，爱国只有一个。爱旧中国，不是爱国；爱新中国，才是爱国。第二，实业是救不了旧中国，即使如张伯韩这样的爱国者，早晚也要屈服于外国资本。这说明在旧中国，企业家无法发展，爱国者不得善终。第三，香港跟台湾一样，代表着旧中国，逃到那里的人，得到的只能是家败人亡。只有回到新中国，才有出路。第四，爱国必须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看来，爱国心就表现在：“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¹这个爱国标准为上面的信息做了明确的注脚。其实，爱国不是能用脚投票的。跑到台湾、香港、美国的中国人，多数爱国。你能

¹ 陈坚、陈奇佳著：《夏衍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第459页。

说，蒋介石去了台湾，张学良去了美国，就不爱国了吗？你能说，滞留美国，不回大陆的胡适、张大千不爱国吗？你怎么面对，那些为保卫祖国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退守台湾的军人？你怎么理解，龙应台笔下的那几百万因为恐惧中共统治而逃离大陆的同胞？

显然《不夜城》的爱国观，与陈毅一样，是政党的爱国观。这是一种偏狭的，荒谬的，以党代国的爱国观。它将祖国所蕴含的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厚多元的历史内容，简化成干瘪浅薄，至今仍在毒化人心的党派教条。

二

这部影片的主旨是宣讲新中国对资本家的成功改造。改造的办法有二，一是让他们负罪，二是让他们感恩。让张伯韩负罪的故事来自于两次工伤。

1948年，磨车工瞿海生被机器“咬掉”了四个手指，过了病假期，不但仍不上班，还率领工人闹事。张伯韩不得不把他开除，瞿海生的父亲瞿永根恳求张伯韩，看在他为张家服务多年的面子上，给海生一条活路，张伯韩只给了他三个月的工钱，算是补偿。瞿永根拿出了工人阶级的骨气，没要这笔钱。

1953年，张伯韩忽视安全生产，要求工人提高产量，导致挡车工沈银娣受了重伤。张伯韩到医院探视，与区工业局领导瞿海生相遇，看到沈银娣伤势沉重，张伯韩自认有罪。沈银娣的公公，瞿永根随后赶到，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吼着要张伯韩赔他的儿媳妇。瞿海生劝慰父亲，瞿永根举起瞿海生被咬掉了四个手指的手给张伯韩看。张伯韩这才知道，跟他谈话的就是他几年前开除的瞿海生。由此更加悔恨交并。瞿海生拿出了工人阶级的气度，教育张伯韩：“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可你们也应该记住这些教训。后悔是没有用的，旧的道路已经是行不通了，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让张伯韩感恩是通过“五反”运动完成的。

先是沈银娣等工人代表找张伯韩谈话，让他交待“五毒”（即行贿、偷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罪行。张伯韩瞒报自己的偷漏税数额，企图蒙混过关，被沈银娣等人揭穿。为了帮助张伯韩，沈银娣到学校里做张伯韩的爱女张文铮的工作，张文铮回家斥责父亲无耻，伯韩之妻也劝他彻底坦白交待。在内外压力下，张伯韩误认为，政府就是要勒索自己的钱财，以便霸占

他的大光明厂。于是破罐破摔，夸大偷漏税的数额，答应退赔 150 亿。

挨了父亲一耳光的张文铮离家出走，伯韩之妻埋怨张伯韩。张伯韩的弟弟，大光明的合伙人张仲鸣对哥哥的夸大偷漏税的数额心怀怨怼，万念俱灰的张伯韩走上了外滩大厦的顶部，看着下面蚂蚁般的车辆和人群，他陷入沉思。他可以纵身跳下去，摆脱一切痛苦。像那 34 名自杀的同仁一样，用结束生命来维护个人的尊严。四川船王卢作孚不是自杀了吗？他给国家民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人家不是还没完没了地逼他交待退赔吗？我张伯韩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他没有跳下去，他的女儿还没有音讯。他的妻子，他的弟弟还等着他，他这么死，又怎么向父亲交待？何况，就是死了，他也摆脱不了剥削阶级的臭名声，他的亲人戴着这顶帽子怎么活下去？

张伯韩慢慢地走下外滩大厦，他不能死，他要活着，摘掉剥削阶级这顶帽子。为自己为亲人造福——世事是如此诡异，想当初，他削尖脑袋，往实业家的队伍里挤，也是为自己为亲人造福。而现在，他千方百计逃出这个队伍，同样是为了自己为亲人造福。

正在这时，天降福音，增产节约办公室来信，把张伯韩列为“基本守法户”，只要他退赔 20 亿。沈银娣适时地出现，告诉张伯韩：我们考虑到你能主动退赔，所以算你基本守法。经核查，你报的偷漏税 150 亿是假的。我们不想要你的厂子，我们是实事求是的。

张伯韩一家感动得无以言表，张上前握住沈银娣的手，道谢连声。政府实事求是，工人宽大为怀，张伯韩能不感恩戴德？负罪感和感恩心的交相进攻，使张伯韩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对妻子说：“死抱着这个厂不放，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出路！我们早晚得坐上社会主义这条船，恐怕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影片的深刻处，在于写出了张伯韩内心的挣扎，尽管他同意公私合营，但是他还要问妻子，也在问自己：“可是我们这厂，你舍得吗？这个事业是我们半生的心血。”并不是像工人代表以为的那样，更不是像张文铮说的那样，张伯韩就是爱钱。是的，张伯韩要赢利，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事业，是他的大光明。这里面有他的理想，他的价值，他的人生意义。

并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价值观决定命运。性格的深处价值观。张伯韩的价值观是实业救国，他是一个爱国者，他要用自己的平生所学，为祖国的强盛贡

献力量。这是影片一开始就交待了的。要是只为了发财，1935年，他就可以把“爱国牌”卖给日本资本家，换取那终生享受不尽的财富。要是只为了发财，1948年，他就可以像很多资本家一样，携金弃厂，逃往香港。宗贻春虽说品质很差，但看问题很准，他劝张伯韩：“老弟，这个年头办工厂办个什么劲呀，吃力不讨好，时局很坏，万一共产党来了，资产阶级，你还想活呀！”张伯韩明知道共产党来了，他没有好果子吃，却仍留在上海苦熬。为什么？他不舍，不舍得他的理想、他的人生意义，他还在苦苦坚守着以实业救国的价值观。

包括沈银娣在内的大光明的工人们，未必有这样的境界。包括陈毅在内的大上海的管理者，能有几人能理解这样的志意胸怀？

黎澍在反思文革时，谈到了当年知识分子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共错误地把“这些看做是改良主义而否定”，“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进步的。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的工作者在自己领域做出贡献，都是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向现代化前进，越是从长远看，他们的工作的意义越大。”¹

而此时的张伯韩，已经重新做人了，他的价值观，从实业救国，变成了自食其力——“难道我们就愿意永远背着剥削阶级的臭名声，永远过着那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吗？我们有能耐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呀？！”

张伯韩放弃了他的人生意义，影片给了他一个最大的奖——失联三年的女儿回来了！一家人团圆在上海的人民广场，“火树银花不夜天”，活下来的资本家们跟全市人民一起庆祝全市的公私合营。

三

张伯韩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自食其力？难道我对工厂的管理，从人事到生产，从原料到市场，这一切付出都不算数，都不是自食其力吗？剥削阶级？难道没有我置办的厂房，没有我买的机器设备，没有我提供的原棉，工人能纺出纱吗？难道没有我开辟的市场，产品能卖出去，工人能发上工资吗？难道我父亲张耀堂，一个穷学徒，当初光着身子，带着铺盖卷来到上海，吃辛吃苦几十年，撑起来的大光明，也算是剥削？

¹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33页。

张伯韩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人需要他解。马克思主义早已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遗憾的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一点也不给这个主义做脸——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刘少奇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不久，整风变成了反右。所有的媒体都投入反右斗争之中。上海工人罢工报导无法见诸报端。刘宾雁在《自传》中告诉人们：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多年后，人们认识到，“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¹大光明公私合营了，张伯韩自食其力了。沈银娣和她的姐妹们却从罢工转向了怠工。张伯韩为了防止工人闹事，开除了瞿海生，不准罢工的社会主义只能在无声中腐烂。

四

无声的腐烂终于结出了果实——九十年代，经济转型，国企转制，资产重组，

¹ 《小鹰概念六日谈》，见《小鹰博客》。

过去的资本家，现在的民企老板重新归来。毛时代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失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胜利。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买办成了香饽饽，宗贻春成了英语精英的前驱。送子女留洋成了不变的风景区，新一代的张伯韩改名“海归”接了前辈的班。1949年有钱人逃往港台场景，以更大的规模上演，移民发达国家成了“中国梦”，凌大年的后人宣称，只有在国外生活，才能获得安全感。

历史成了“鬼打墙”，无数啼笑皆非的故事在无数家庭中上演：当年领头清算张伯韩的沈银娣，其儿女遭到“改制”的清算，或外出打工，或操持贱业。瞿海生当年因闹事被张伯韩开除，投奔了共产党。四十年后的瞿海生还不及闹事，就被买断了工龄，赶出了工厂。他们投奔的只有律师事务，而等待维权律师的，是“709”大抓捕（2015年7月9日，中国警方约谈、抓捕多名律师。详见《709事件是什么》等网文）。1949年，张伯韩因为拖欠工资被工人围堵在办公室；2009年，陈国君（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命令工人复工，被工人殴打致死¹。背了一辈子家庭包袱，努力改造仍不受重用的张文铮，这时候才觉悟到自己吃了大亏。聊以自慰的是，她的儿子，张伯韩的外孙，继承乃祖的事业，重新当上了资本家。

张伯韩们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被工商业改造拦腰打断。四十年后，资本主义换了个说法，重新进行原始积累——工人们吃大苦流大汗建设的国有厂矿，在资产重组的名义下，落入民企老板手中。工人从名义上的主人公，变成了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且大批下岗。以襄阳轴承厂为例，该厂老党员、老工人鲁爱国写道：2003年该厂“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2004年，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争。襄轴、襄棉、钢丝绳厂、化纤厂、制药厂的工人……几万人涌向城里，要求和市领导对话。省公安厅厅长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他刚说完，一工人走上讲台发问：“厅长

¹ 通钢事件，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9%92%A2%E4%BA%8B%E4%BB%B6/8793344>（最近登录时间：2018年7月1日）。

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2月7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身份买断。¹毛时代宣传的“吃两遍苦，受二茬罪”，在后毛时代，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

五

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夜城》是唯一一部歌颂工商业改造的影片。此片封镜之时，正值反右，由于担心成为反右的靶子，厂方将其封存。1965年，此片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并列为“四大毒草影片”，为了“供批判用”，与观众见面。仅1965年6月到9月，“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争议与批判文章达260篇以上。”²

文革期间，写作组以罗思鼎、丁学雷之名，向这部可怜的电影发动了持续十年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编剧柯灵、导演汤晓丹，以及上海管宣传、文化、统战的领导都遭到批斗。柯灵后来回忆：“强加给刘少奇同志所谓的‘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陪斗。甚至祸及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当然是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在地下也要张口结舌，自叹不如。”值得一提的是，全市游斗的场面，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与《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相媲美。³在批判者眼里，这部影片一无是处：它为资本家歌功颂德，把“张伯韩塑造成反帝爱国，积极发展生产的‘时代英雄’。”⁴它丑化工人阶级，“要求工人群众不要记阶级仇恨”，以便“维护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瞿海生这个区委工业部长不是中共干部“而是阶级投降主义者。”⁵张伯韩的女儿张文

¹ 《一位老工人党员：补交党费引起的风波》：<https://tieba.baidu.com/p/5843259550?traceid=>（最近登录时间：2019年9月15日）。

² 张学正主编：《文学争鸣档案：1949-199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第644页。

³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我的人生旅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2-3页。

⁴ 赵志强、刘景清：《为资本家歌功颂德》，载《解放日报》1965年6月28日。

⁵ 以群：《宣传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不夜城〉》，载《文艺报》警9675年第7期。

铮是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而影片却把她吹捧成了一个追求进步，背叛家庭的共青团员。¹

这部影片似乎就是为批判而生，一旦停止批判，它的银幕生命也随之结束。后毛时代赋予这部影片新的生命，将其打捞出来，洗掉历史的污迹，剖析其中的迷思，探讨其中的新意，这里仅仅是开始。📖

【读片与读书】

聂元梓是一本怎样的书？

舒 声

聂元梓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去世，终年 98 岁。对于她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惋惜者也有之。8 月 30 日，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有署名老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把聂元梓的一生比喻为一本教科书。该文作者对聂元梓显然是充满同情和肯定的，他写到：“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革命后官场产生了朴素的批判性，晚期就此受到官场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作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愿聂老安息！”

从《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老田的照片，相貌其实不老，也就 40-50 岁，他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结论呢？这类未经过文革的中年人对文革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却产生了这种肯定文革和文革中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不让人感到，否定文革的思想并未深入人心，彻底否定文革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其实，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都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这本书都是每个人自己亲笔写出来的。所以老田把聂元梓的一生比喻成一本教科书，并没有错。那么聂元梓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¹ 吕启祥：《把青年引向何处——剖析《不夜城》中的张文铮形象》，载《光明日报》表 965 年 7 月 28 日。

作为北京大学文革的亲历者和北大文革历史的探究者，笔者对聂元梓的一生历史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特提出以下观点与老田及其他研究者共同探讨。

聂元梓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前；第二阶段，文革期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她的人生高峰阶段；第三阶段，从文革后到去世。

一、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的信奉者和实践者

聂元梓初中毕业后在其兄聂真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先到山西，又回河南，再到山西，再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经历了整风和“抢救”运动。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工作，成了“年轻的老革命”，12级高干。1959年与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1960年6月调到北学，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和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但在她头脑里充满的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理论和极左路线的观点，突出地体现在北大社教和文革中。

1964年7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调查组进驻北大，先后找了校系部分负责人听取汇报和谈话，除了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外，都很不满意。7月15日上午，聂元梓第一次到调查组汇报、谈话，时间很长，直到下午1点多，有些意见仍未说完，因而第二天，即7月16日，又主动来张磐石谈。那么聂元梓究竟谈了些什么，从而受到张磐石的青睐呢？据一直参加谈话的调查组成员阮铭说：聂元梓“主要谈到是有关哲学系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谈到哲学系党内斗争的情况，最后给党委提了些意见，说党委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干部工作方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¹张磐石自己也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聂元梓主要还是讲了阶级斗争，而且揭发了些问题”。²

7月23日和25日，张磐石又两次找聂元梓谈话，听取她的意见。这两次，聂元梓讲得更为露骨，她讲的主要内容是：

（一）北大党委“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

她说：“我们学校离中央很近，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如果说执行的话，也是停留在上面，未深入下去，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校领导对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和阶级斗争是不了解的……和哲学系没有研究过。学校领导对

¹ 见《阮铭同志9月23日在哲学系小组会上的发言》。

² 张磐石1964年7月15日日记。

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情况，教学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到底怎样，也是不了解的，你在下面由你自便。这样一个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办法，怎么能贯彻好中央的指示？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呢？”她举例说党委不贯彻中宣部“在哲学社会学部会议的报告”，不贯彻“工业学大庆”精神，贯彻《高教六十条》也是形式主义等。她还暗示：北大不仅不贯彻中央精神，还存在着说假话，制造假经验的问题。¹

（二）北大党委“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

她说：“我一来就觉得有问题，看了总支委员名单，好像到了另外的世界……现在看来更清楚，在干部政策方面存在着：

1. “有个小圈圈，在校一级领导干部中，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学书、人事处长伊敏、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都是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另外加上燕大、北大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是两门干部，未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对他们破格提拔，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而是气味相投，北大主要是他们来领导”。

2. “陆平同志可能是糊糊涂涂，也可能是清清楚楚地提拔重用了一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她根据听来的一些材料，举了 10 多个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列数了他们成分如何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如何复杂，本人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等等，并说：“他们在下面也弄了一批这样的人，所以说，（北大党委）在使用赶不上看不到原则，起码也是阶级感情问题。”²

（三）北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不仅在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

她说：“北大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教研室工作等各方面看，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北大已经到了顶头，哲学系的工作到了最后界限，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要搞好就要革命”。³

张磐石对聂元梓讲的哲学情况和意见，十分欣赏，十分重视。尤其是对他讲的北大中层干部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问题，认为是抓住了北大问题的突破口。在听取了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后，8月29日，调查组向中宣部报送了《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不纯的一些情况》，即所谓《一号报告》。

《一号报告》中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北京大学党员干部政治上不纯

¹ 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² 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³ 胡光伟《聂元梓同志与张磐石同志谈话记录》7月23日。

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党委和行政领导的重要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学部门，以及一部分系的党总支，实际上都是掌握在一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手里。他们有的是本人政治面目不清，历史上有过重大政治问题没有审查清楚的，有的是出身反对剥削阶级家庭，父母被我镇压的，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和大右派分子的子女。而且这批人，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进入党内，一入党就在学校当领导，没有经过用严格的锻炼和考验的”。¹

从以上情况来看，聂元梓认为自己是来自根据地的“老革命”，对北大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充满歧视态度，认为北大干部严重不纯，北大各个部门都充满了阶级斗争，她的阶级斗争观点是多么“敏锐”和强烈，她的看法是多么极端化，这种极左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张磐石和调查组，形成了对北大党委和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对北大当时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文革，成为文革的前奏和第一张大字报发生在北大的基础。

聂元梓不仅在工作中阶级观念强，处理家庭问题上也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极左的思想方法。她第一个丈夫由于犯了错误，运动中受了处分，她就赶紧划清界限，离了婚。1965年秋，她为了找一个政治靠山，又和比她大20多岁的老干部吴溉之结了婚。在吴溉之家里与安子文、邓觉先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两人的关系不正常，就通过关系找到了康生汇报。惯于制造冤假案的康生把邓觉先打成了“英国特务”，抓了起来，使其屈死囹圄。在聂元梓2005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自己是“杯弓蛇影”，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太过分了。而因此，老革命干部（四级）吴溉之也受了牵连，在康生的指示下，聂元梓不得不再次离婚。

二、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带着社教时的阶级斗争极左观点，在得知彭真已经出了问题时，政治投机，带头写了那张让她出名的大字报，在文革中炙手可热，成了万人瞩目的造反派头头，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表扬和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青睐（亲自在钓鱼台和她谈话），先后当了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与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同时成为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她也因此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她领导的校文革对内迫害干部教师

¹ 1966年8月9日调查组报送中宣部《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不纯的一些情况》。

学生，对外到处夺权，直到公然在北大发动武斗，用武力镇压反对她的群众，打死打伤无辜学生，引起最高领导人的震怒，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夺了她的权。她在文革的舞台上实际只表演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1969年后，她先后在江西鲤鱼洲和北大校内劳动，直到1978年被捕，1983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84年聂元梓从延庆监狱保外就医，1986年被宣布假释。她出狱后居无定所，没有收入，身体有病，曾给胡耀邦、习仲勋等领导人写信请求帮助，后在有关部门帮助下解决了居住和医疗问题，每月也有了固定收入。可以说她既是文革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也是多数造反派头头遭遇的一个典型。

三、死不认罪和不悔改的顽固派

聂元梓被释放后，在2005年出版过《聂元梓回忆录》，2017年出版《我在文革漩涡中》，在这两本书中，她都极力为自己开脱，只承认在文革发动者、领导者的指示下犯了一些错误，对发动文化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承认自己有罪，还自我表功。在《聂元梓回忆录》的自序中，她写到：“在这本回忆录里，我不但要推翻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也要为那些受我罪名株连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洗清不白之冤。”她在1985年7月1日给胡耀邦的信里说：“在文革中，我较早地有了觉悟，反了林、江一伙，受到他们的打击迫害。”“我认为这个判处（指1983年3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唯一根据是王力捏造的假证明，诬陷我按江青授意去上海造反参与阴谋夺权，我请求党中央重新处理并恢复我的党籍和工作，宣布无罪，受林、江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同样应该平反。”¹在2003年1月3日，她给胡锦涛写的信里说：“这样的判决，我不理解它有什么法律效力，现在，我对判十七年徒刑和相互矛盾的定罪，不提起申诉，因为我坚决地相信党总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会公正地宣告于世，历史也会自有公论。”²在从被释放到去世的30多年中，她一直没有认罪，也没有表示悔改，在接受采访和与她的老部下谈话中始终如此。

在临死的前两年即201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466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² 《聂元梓回忆录》附录1，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在她的自序“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中还在为自己辩解，说文化革命“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还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以‘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恰逢其时地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简单的‘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党员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积怨的症结。”同时还在为自己到上海造反、迫害邓朴方导致残疾等具体问题上推脱责任。^①像这样至死不悔的顽固派确实很少见，可能也正因为是坚持着这口气，使得满身疾病的聂元梓竟然活到了98岁的高龄。

四、聂元梓这本书值得研究

聂元梓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从一个初中生到革命干部，到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再到犯罪分子和刑满释放人员，她的一生经历复杂，角色多次变换，确实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射和历次政治运动对一个人的影响，特别是文革这场浩劫对人性的打击和摧残。所以这本书是值得研究的。但它究竟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聂元梓究竟是战士还是苍蝇？只有在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摘】

精神病理学 · 性生活 · 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动

宋永毅

任何政治人物在从事他们的政治活动时，当然主要是出于理性考量：或是基于自身利益，或是基于政治信仰。但是，这些人物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崛起的政治心理学告诉我们：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如果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

¹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自序，第8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

病，这样的心理疾患是否也会影响、或有限地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

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哈罗德·D. 拉斯韦尔 (Harold D. Lasswell) 在上世纪连续出版了《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世界政治和个人的不安全感》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1935)、《权力和人格》 (*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8)，¹ 开创了一种用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新尝试。本文也正是借助于这些“他山之石”，来“攻”江青研究之“玉”。因为作者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错讹之处可能在所难免。但如同拉斯韦尔所言：“尝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政客都‘精神错乱’。实际上，对于揭示不同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这一核心问题来说，具体的病理是次要的。”² 同样，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江青具体的精神疾病，而是意在提供一种文革研究的新的方法和视角。

一个曾被医生下过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

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分析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动，一个首要前提是必须说明她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点无需哗众取宠和危言耸听，是有着坚实的病例和病历为事实依据的。江青自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声称她有“重病”。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在给她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后，并没有发觉生理器质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认为她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作了正式的报告。³ “强迫观念”也称为“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精神疾病。“双重人格”，也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最新的精神病学上已经被归入林林总总的“变态人格”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大范畴，当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另外，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医生诊断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Neurasthenic)，有着严重的失眠、恐惧、脾气暴躁等症状。这一病状在目下的国际精神病学中，也已经被归

¹ 在哈罗德·D. 拉斯韦尔上述经典著作中，《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和《权力与人格》已经有了中译本。

² 哈罗德·D. 拉斯韦尔著，魏万磊译：《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³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246-248页。

入精神疾病的范畴，¹ 它常常和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恐惧症（Phobia）及强迫症有关。简言之，江青的精神方面的病疾，是为医生诊断过、并有过初步结论的。

另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他在 1968 年刚刚去江青处报到时便被告知她有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Autonomic dysfunction）的病，“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无独有偶，这一疾病林彪竟然也有，用林夫人叶群的话来说：“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是知心朋友……性格是一样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样的，都怕风、怕光、怕声响，都好出虚汗，……是同病相怜呀！”根据有精神病学领域“圣经”之称的、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 DSM-5），它和三种精神疾病有关联：1）睡眠-觉醒节律障碍（Sleep-Wake Disorders）；2）物质相关和成瘾性障碍（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3）路易体神经认知障碍（Major or 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With Lewy Bodies）。

在中文世界有关精神病的著述里检索一下这种怪病的症状和起源，也会发觉它常常由心理因素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一种内脏功能失调的综合征。包括循环系统功能、消化系统功能或性功能失调的症状，多由心理社会因素诱发人体部分生理功能暂时性失调，神经内分泌出现相关改变而组织结构上并无相应病理改变的综合征。……情绪症状表现为烦躁、焦虑、情绪不稳、多虑、多疑、多怒、紧张恐惧、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等。”换句话说，这一所谓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可能是江青原来就有的精神疾病造成的。

在众多的江青的传记和江青接触过的人的回忆录中都对她得精神疾病的过程有所描述，稍作浏览还会发觉都大体符合现代医学关于该疾病发展的脉络。江青在中共建国以前大概因为卫生条件的限制，得了子宫颈糜烂的妇女病，1955 年被妇科专家检查出有癌变：“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疗，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¹ 同上，第 104-105 页。

¹根据陪江青同去苏联的翻译的描述，江青在苏联“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²。但问题是江青本人并不这么看。据她身边的医生观察，尽管“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³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像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生上了瘾。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⁴

从现代精神病学的数据来看，癌症病人如果不能对自身疾病缺乏了解并过度的恐惧，是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等心理疾病的。“一项研究以3个癌症中心的215名癌症病人为对象，调查研究他们当中精神病的患病率。德若伽提斯(Derogatis) (1983)发现47%的病人出现精神病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病人换上抑郁症的几率也增加。”⁵

然而，江青在上面所讲“恐惧感”恐怕绝非只是对癌症这样一种疾病的恐惧，更是对由此而引发的对她和毛泽东婚变的恐惧。因为上述的妇女病，江青大约和毛在1955-1956年间开始便没有了夫妻间的性生活。毛泽东虽然没有和她离婚，但不停地在外面找年轻的女人，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恐惧：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毛为了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也没有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

¹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77页。

² 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地4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521124946_all.html

³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8页。

⁴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43页。

⁵ 林英尊：《抑郁症：被误解的疾病》，新加坡：盔甲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139-140页。

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但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不要她。¹

对江青的病源，毛泽东其实心里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御医李志绥开诚布公地说过：“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²

这其实并不奇怪。这种因丈夫的外遇而导致妻子的精神疾病，在现今的网上被称为女性的“外遇型的精神疾病”，属“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心理疾病的来源。³不管毛泽东对婚姻的不忠是否是江青的病源，江青在文革前便有不轻的精神疾病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来颇具讽刺意味，1958年那一群医生诊断江青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时，开出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建议江“多参加文娱活动”。⁴不料没多久毛真的派江去了文艺战线，先搞京剧改革，后又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在政治风暴中独领风骚、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旗手”——这大概也是李志绥等一群中国医生们所始料未及的。

歇斯底里、偏执型人格和政治报复

据李志绥回忆：“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也好过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她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李医生又补充道：江青对和她有裂隙的人“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她报复的机会”。⁵事实上，政治野心的满足可能一时减轻一些江青的心理疾病的症状，但绝不可能根治它们。上述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杨银禄的证言表明，这些症状还都是存在的。而因为江青在文革中口含天宪、权倾一时，更严重的问题发

¹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37页

² 同上，第138页。

³ 可参见邱念睦医师的〈女性心理疾病與社會適應〉他指出：外遇型的女性精神疾病“文獻上確定重鬱症之發生率為女多於男，甚至可為男性之二倍”。<http://taiwan.yam.org.tw/nwc/nwc2/chiou.htm>

⁴ 同上，第244页。

⁵ 同上，第387页。

生了，那就是她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在政治运动中的大肆报复。江青确实是带着她的精神病疾进入文革岁月的。但是她患的毕竟不是完全丧失自主意识和语言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那些心理病患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她的政治活动，但毕竟还没有到主导她全部意识和人格的程度。

如果说被追逐权力对恋爱中的女人是一种天然的春药，那么被掌握的权力对使用她的女人更可能是一种可怕的毒药。举“报复心”为例，原来也可能是一般的女人所共有的一个性格特征。江青曾在接受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访问时坦承：她少女时对欺负过她的人就有很强的报复心。例如，1929年她被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录取，主要学习现代戏，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课。当时仅有3个女生的班上，另外2个与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江青，因为她穿着破旧。于是江青“设法搞恶作剧报复”：

学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庙里，夏天，房间非常闷热。下课后，学生经常到大殿乘凉，江青清楚地记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伫立在大殿中央。他戴着巨大的、前后带珠帘的帽子，两侧是72位圣贤，他们是他的弟子。一个闷热的夜晚，江青走进大殿，在一把旧藤椅上坐下来。那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命令她搬椅子给她们坐。江青顺从她们的要求，先提起一盏灯笼，帮助她们搬来两把椅子。可是当她们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后，江青却不动声色，提着灯笼悄悄溜出殿外，把门关上，逃之夭夭。两个女孩子突然间被关在阴森可怕的大殿内，吓得大叫救命。……¹

一般说来，报复是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因另一个人的行为而产生一定量的损害，那么前者的报复心理会期待让后者也产生不低于该量（一定量）的利益上的赔偿，或也产生不低于该量的利益上的损害。在江青少女时的上述“恶作剧报复”中，我们看到这个“量”的范畴是得到控制了，因而还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的人格和心理行为。然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在访谈时还敏锐地发现：江青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故事“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直到她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毁灭他们（这里指江青要打倒的对象）。个人复仇被融合到了为毛的

¹ 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4-55页。

政治服务的方针中，驱使她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¹ 在江青文革的政治活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政治权力极端地扩大和深化了她的报复心理，以致使她做出一些令人很不理解非常态甚至病态的失控行为来。

1966年7月26日晚间9点多，江青、陈伯达、康生带着中央文革全套人马在北大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这大概是江青在文革初期的群众大会上的最早的讲话之一。然而，江青在大会上突然讲了一件毛泽东家庭里的亲属间的矛盾，并把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据当时红卫兵传单中的简要记录，江青是这样愤怒地声讨了毛的第二个儿媳妇邵华（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就读）和他的母亲、即毛的亲家母张文秋：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她很激动，讲不下去了）

2

据说当时的万人会场一时寂静了下来，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这个“张少华”是何许人，为何惹得第一夫人如此大发雷霆。至于张文秋，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说她是“政治骗子手”的“全国通报”（并不存在）。这里还有当年在会场上北大学生绘声绘色的回忆：

突然有嗓子嘶哑的女人哭声响起，会场顿时寂静下来。

我要控诉，我要抗议！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江青在扩音器

¹ 同上，第5页。

² 《中央首长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

旁哭述起来：“特务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气愤！我要控述！”

这下会场上万双耳朵都竖起来了，大家踮起脚尖要看是谁在哭述，一看是江青，伟大旗手！只听江青沙哑地喊：“张少华在不在？”

整个会场都晕了，不知道旗手喊的是谁？

有人对着麦克风大喊：“张少华在不在？”无人答应。谁叫张少华？上万人堕入五里雾中！

江青手舞起来，喊：“同学们，小将们！你们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他就是推行叛徒特务路线！在张承先的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叫张少华的，女的！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注：始终未看到全国的通报）！张少华说她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同学们，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同学们，小将们，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够了彭真周扬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我要控诉！我要控诉！”¹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江青在这个万人大会上的表现不仅大失她作为“中央首长”的人格和第一夫人的身份，还表现为一种底层泼妇式的歇斯底里。然而，歇斯底里症（英语：Hysteria），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种精神疾患的外显。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已经被归入“人格变态”的范畴，也就是文革前医生给江青诊断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障碍”。²通俗地说，它主要是说在一个人身上有超过一个的人格存在：除了正常的，还有非正常的。在世界精神病学的著述中罗列的十余种变态人格里，有一种叫“偏执型人格”（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征似乎比较符合江青的上述表现。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罗大华在他那本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变态人格的：

偏执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心胸狭隘、报复心强、自我

¹ 老兵夜话 <“毛主席家里的阶级斗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ed063f0102e20f.html.

²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p. 545-552.

评价过高、容易攻击冲动。一方面可表现为骄傲自大，自命不凡，总认为怀才不遇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在遇到挫折或失败时又可表现沮丧、埋怨、怪罪他人，推诿于客观而易与周围人或领导发生冲突。他们常产生关于被害的、关系的或嫉妒的超价观念（由强烈情感加强了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可能产生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¹

精神医学上所讲的人格，是以性格为核心，还包括先天素质、气质、智能、适应社会的方式与能力以及个人的心理特征等方面，是由躯体的、心理的、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稳定复合体。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人格结构和它的组成部分在均衡发展上产生障碍，突出地表现为情感和意志明显偏离正常。我们不妨来对照分析一下，江青如何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表现出种种“偏执型人格”的特征。首先，江青的表现“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事实是：邵华（张少华）和毛泽东第二个患精神病的儿子毛岸青的婚事是得到毛亲自批准和支持的，而且毛岸青也不过是江青的继子而已，有他的亲生父亲毛泽东同意应当就可以了。而江青因为对此婚姻的不满，便猜疑成一种至少邵华母女是想在毛泽东家里和她争权夺利的阴谋（“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²还要把邵华的母亲张文秋胡说成“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其次，江青把他和毛的家事搞到万人大会上纲上线，又可见她的“心胸狭隘、报复心强”和“容易攻击冲动”。据江的秘书回忆，江青和她的两个继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长期不和。她一直把他们作为在毛泽东身边要清除的“杨开慧势力”。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逝世后，有精神病的毛岸青就成了下一个要从毛家赶出去的对象。江青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到的那个护士（“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其实是毛岸青在苏联治疗精神病时的一个苏联护士。江

¹ 罗大华（1936-2015），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983至2010年担任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他主编的《犯罪心理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犯罪心理著作，为司法部统一教材。它不仅在大陆出过6版，在台湾也出版过。在这里的引文来直他著作的“在线阅读”。<http://m.yuexinli.com/fanzuixinlixue/fanzui/1619.html>

² 网络上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江青之所以迁怒邵华和她母亲张文秋，是因为她们和毛有不正当的性关系。但此说至今缺乏可靠的证据。可参见：〈毛泽东乱伦：一张从未被发现的毛乱伦照片〉，<http://www.aboluowang.com/2012/0109/231894.html>

青非常支持这件跨国婚姻，还提前送了新娘礼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毛岸青定居苏联，永久地赶出毛家。¹最后，江青还确实把自己放在“受到迫害”的地位（“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从而把这一变态离奇的“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在她的另一重变态人格中上合理化。当然，因为邵华毕竟是毛泽东喜欢的儿媳，江青的这一行为当时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严重后果。

应当补充的是：江青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冲动”在文革中屡次发生，而且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有时，江青的“攻击性”竟发展到在公众场合使用暴力的程度。以下是几幕鲜活的历史记录：

其一，因为宋庆龄是以娴静雍容、温文尔雅闻名的民国第一夫人，一直为江青妒忌。加上文革初宋又对江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江青便多次在公众场合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并“像发了疯似的”用“双脚践踏”，还“咬牙切齿地咒骂”²。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类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简直就像发神经。”³

这里应当一提的是：当年和江青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并非陈伯达一人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原《光明日报》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也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为此，江青“不能容忍”，坚持把他打倒。⁴

其二，1966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因为她的揪出贺龙提议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采纳而放声大哭。陈伯达因和她不和，便用嘲讽的口吻劝了一句。不料江青“腾地站起。直对陈伯达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还配穿军装吗？’说着，江青什么体面、影响都不顾了，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服领子，用力一拽，只听‘扑哧’一声，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⁵

¹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第120页。

²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又见〈文革中江青与宋庆龄的矛盾〉，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2576655.html>

³ 陈伯达《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308页。

⁴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718页。也可参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第354页。

⁵ 施为鉴：《不为人知的江青》，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55页。

其三，因为江青多次撞见毛泽东和他的年轻女友的“大被同眠”而醋罐打翻，毛泽东便在1969-1970年左右下令警卫部队未经他批准不允许江青到他的住处。

¹有一次，江青为警卫人员阻拦，便手提木棍，要动手打人。²

其四，江和毛分居后老是要干涉毛的起居饮食，均遭到毛的严词拒绝。一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来传达毛不允许她“干涉”毛的饮食的指示，当场被她“气急败坏地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张耀祠抚摸着疼痛不已的腿，真是哭笑不得”。³

其五，1976年9月18日，江青竟和毛泽东的表侄女王海容一言不合，就在毛的追悼会上大打出手……⁴

对于江青在政坛上的种种歇斯底里和耍泼撒野的表现，毛其实完全是心知肚明的。1967年8月毛在武汉，正值武汉事件发生，江青和林彪（叶群）等人在北京大造舆论，要一举揪出所有“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的御医李志绥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⁵

这里的“阿金”，是指鲁迅小说化的散文《阿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城市女佣。她虽然出身卑微，但不甘于做人下人。她行为放荡不羁，敢于耍泼撒野。阿金一来，便引发了周围男人们的追逐和巷战。鲁迅在文中自嘲说：阿金摇动了他三十年来的信念。他一直认为男性的作者“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是冤枉，“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

¹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64页。

²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第109页。又见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99-200页。

³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第108页。

⁴ 索尔兹伯里（Charlotte Y. Salisbury）〈毛氏追悼会上江王大吵——采访宋庆龄的回忆〉，香港《文汇报》，1990年8月5日。

⁵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75页。

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¹ 毛泽东那时讲江青、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其评价当然是负面的。毛深知她们是可能“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的“女王”或“皇后”。但时隔不到两年，却又是同一个毛泽东，却批准了江青和叶群一起在九大进入中共最高的中枢机关当了政治局委员。据说毛泽东还说过：“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²西方的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颇具真知灼见的观点：“毛不担心江青的要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³

江青的这种无端猜疑和疯狂报复的变态人格，在打倒刘少奇和把他夫人王光美诬陷为“美国战略特务”的专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从历史问题上入手、调查并拼凑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创造发明。在公正的历史研究中，江青完全没有必要为毛承担任何他的罪孽和过错。这里必须反对用批老婆来为皇帝戴罪的“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然而，江青在这一文革最大的冤案中确实又有她个人的创造和发明。所谓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亲自任组长的。当时主要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皮相地看来，江青和它的关系并不大。然而，谢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个批示中却泄露了天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在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首先报告江青同志。⁴

¹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

²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579页。

³ Jung Chang 张戎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Globalfair Ltd., 2005. 见中译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539页。

⁴ 纪希晨〈江青的魔爪和丑态〉，《人民日报》，1980年12月4日。

江青自己在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庭审中也承认她插手这一专案工作是“受了委托”——当然是来自毛的“委托”。¹然而，对刘的妻子王光美的审查，并把她打成“美国战略特务”便基本上出自于江青的首创。其实，这一罪名的极度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据专案组称：王成为美国特务是她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前后。届时王只有24岁，并没有和任何美国政府人士有过接触。她被北京地下党介绍去当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英文翻译是1946年2-3月的事，而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一年前解散了。但当时在江青的亲自批准下，专案组逮捕了原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后任河北师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和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承祚。江青要他们承认发展了王成为美国的“战略特务”。而其中张重一根本和王“连话都没有说过”。²张、杨两位浑身是病的老人都死于王光美专案组的疯狂刑讯逼供之下。专案组的初步结论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而江青对这个已属荒谬的结论还大不满意，打了一个大“X”，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结论又升级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还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了。³

从江青和王光美的历史交集来看，两人之间似乎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江青要对她如此逞凶施虐呢？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开过一个批斗王光美的万人大会。据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光宇后来揭发，江青派关锋去清华大学暗中操纵，还特别要求造反派给王光美穿上她出国访问穿的衣服项链以示侮辱。⁴这一细节清楚地揭示了江青的仇恨和她对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频频出国访问的嫉妒有关。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第一夫人情结”。照理，江青自和毛泽东结婚始，便已经是中共的第一夫人，应当没有这一情结。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一方面她固然是第一夫人，但在她嫁给毛泽东后的很长一段

¹ 同上。

² 孙浩刚、李庚晨〈迫害狂——江青〉，《解放军报》1980年12月9日。

³ 李耐因〈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载《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⁴ 王光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光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78-182页。

时期，却无法获得她向往和应有的地位和名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她应当可以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却又因病而和毛长期分居，从没有随毛出国访问而名不符实。而王光美，却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情结”（complex）作为一种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既然情结是一种“结”，必然在无意识的汹涌中呈现为难以消解的纠结和矛盾。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同样难以消解的嫉妒（Obsessional jealousy）。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看，这是“强迫症或和它有关的人格变态”（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的临床表现之一。¹而“强迫症”，又正是文革前的医生们对江青心理疾病的初步诊断之一。应当补充的是，这种难以消解的嫉妒，在上述精神病学的著作中同样是江青的变态人格－偏执型人格的临床表现。²

如果说江青的嫉妒只是存在于她的主观意识里，不转化为行动，便不会构成犯罪和对社会的危害。而根据罗大华的《犯罪心理学》，由这种偏执型人格导致的精神病，是危害社会最多、最容易导致犯罪的精神病类型之一：“偏执性精神病人因其意志行为受妄想影响和支配，……往往导致伤害、杀人、诬告、反社会言行等各种危害行为。……很可能对妄想对象采取报复、攻击行为”；而“嫉妒妄想”则更可能恶性发展到“凶杀行为”。³如果说文革前的江青，因为手中无权，哪怕她妒火焚身也无法对王光美实行报复。而文革使江青差不多到达了权力的顶峰，她可以轻易地利用国家机器（如王光美专案组）置王于死地。王光美确实差一点被枪毙。九大以后，林彪为讨好江青和她的专案，批示判处王光美死刑，还要“立即执行”。后因毛泽东念及旧情，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幸免于难。⁴

从被迫害妄想到现实中的迫害狂

¹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p. 264.

² 同上，pp. 649。

³ 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http://m.yuexinli.com/fanzuixinlixue/fanzui/1619.html>

⁴ 〈迫害狂－江青〉。

作为毛泽东的文革同谋和主要打手，除去她的领导责任，江青还直接诬陷和迫害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数量在1980年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官方起诉文件中有如下披露：

被告人江青随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是很难统计的。我们仅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这段时间，从江青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就查出被她直接点名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等等罪名的干部、群众即达一百七十四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凡是被她点名诬陷的人，绝大多数都遭受了各种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伤了，有的被整残废了，有些人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¹

为此，江青在文革后的批判文章中常常被人们称为“迫害狂”。说到江青的诬陷和迫害，这里还有一些反常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在为江青迫害的对象中，当然有很多是她明知对方不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反革命”的。但是江青为了毛的权力斗争的需要，有意罗织罪名、陷人于囹圄之中。这一类的政治迫害，没有江青也照样会如期进行，她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另一种则不是如此。他们并非来自毛的意愿，江青却似乎确实怀疑和认定被迫害的对象有问题。尽管江的这种主观意识在稍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看来都是荒唐不羁的，但江青当时却言之凿凿，信之不疑，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戏剧的效果，以致不时地闹出笑话来。

在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则“一颗安眠药、惊动政治局”的故事。讲的是1972年3月4日晚上（林彪事件以后），江青在无意中吃了护士晓兆给她的备份安眠药，忘了，还责怪晓兆没有给她。本来这件小事到此就可以了结了。但是江青一听说晓兆是“广州军区调来的”，立刻就怀疑她是“黄永胜派到我这里来的”。还打电话叫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调查这一林彪集团“迫害”她的阴谋。江青的胡闹显然没有得到她同事们的支持，因为晓兆不过是

¹ 〈公诉人江文对被告人江青所犯罪行的发言〉（1980年12月24日），载《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第68-69页。

一个护士，而所有江青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由医生决定的，和护士没有任何关系。连和江青一起同为“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对江青的这种做法看不惯……在一旁默不作声”。但江青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怀疑是错误的，而是充满了进一步的恐惧，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还吓得“脸上的肌肤在颤抖”，连“拿笔写信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口述的方法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正式的“受迫害者”的求救信，如下：

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功能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做主……¹

毛泽东当然没有理睬江青这一可笑的猜疑。但是江青却仍然把它作为自己受到林彪迫害的重要案件资料锁入保险箱。很显然，江青认为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怀疑和她被迫害都是真实的。此类被迫害的妄想文革中多次发生。例如，她将这种受迫害的情结扩展到毛泽东身边，认为毛身边也有一个由医生护士等人组成的阴谋集团，并当着毛的面唠叨不止。最后，毛实在不胜其烦，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²江青这才哑口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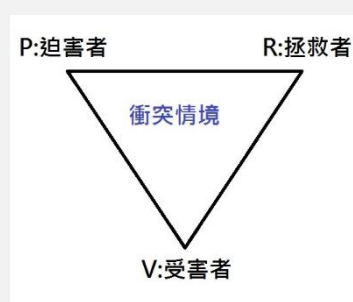
精神病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ory type of delusional disorder），大都属偏执型人格变态。它的临床表现是“患者会自觉受到迫害，如言语上的针对、嘲弄、跟踪及监听等，患者更可发展出很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发生障碍，是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症状。患者可伴有幻觉，但无其他明显的精神症状。病人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幻想。”³

¹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第93-99页。

² 同上，第107页。

³ 见维基百科中的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被害妄想>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夫·卡普曼（Stephen Karpman），为医学博士。他曾任美国国家海军精神科医生，与人际沟通分析学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简称TA）创始人艾瑞克·伯恩博士（Eric Berne）一起工作。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所有的心理游戏中都有迫害者、拯救者与牺牲者这三个角色，而每一个人都常常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中互换位置。为此，他创立了著名的“卡普曼戏剧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¹



按照这一理论来分析江青的迫害狂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来源是她长期的“受害者”情结，或被迫害妄想症。在这一互换的过程中，江青先是把自己在幻想中虚构为一个被迫害者（“受害者”），而所有她要打倒的政治对手和整肃的对象又被想象为对她进行疯狂迫害的人（“迫害者”）。这样，她就有了道德的支点和合法的理由去反击这些迫害她的人，而成为一个“拯救者”。其实，正是她在虚构世界里被迫害的妄想使得她在现实世界里成了疯狂的迫害者。对此，为江青写传记的美国学者特里尔（Ross Terrill）有类似的观照：“可以肯定地说，江青是好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自我防卫”“江青经常沉湎于幻想之中。少女时代的她就充满了激情和梦幻……现在亦无大改变，她感到肩负着某种使命的冲动，她觉得自己成了冲锋陷阵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²

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块非常大的历史心病，那就是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演员的那段历史。其实，江青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文艺青年，也从不是什么“叛徒”。她在爱情上的追求也并非是低俗淫荡的；相反，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

¹ Karpman, Stephen. *A Game Free Life*. Drama Triangle Publications, 2014.

² R. 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191页。

代新女性在那个时代追求自由和女权的努力和波折。在文革中曾是第一任江青秘书，现又成为文革研究专家的阎长贵先生对江的这段历史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 30 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 30 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 30 年代的另一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 30 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这也清楚地表现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 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相比，江青的 30 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¹

虽说阎先生把江青的心理问题延伸到古今中外的一切大人物身上有一点以偏概全，但对此是一种“变态心理”之说，实为神来之笔。首先，江青所投身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她青年时代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天敌。加上中国几千年以来对女性参政的仇视态度，江青在她的 30 年代的演员和文艺青年的经历当然不是一种英雄血统，相反是为人垢恨的履历。这大概使江青感到了“受害”的压力并成为要掩盖它的原因之一。其次，江青在 30 年代虽然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但无论在地下党还是在左翼文艺界，都毕竟是一个小角色。江青要“吹嘘自己 30 年代的革命经历”，就必须把自己的作用无限放大。30 年代上海中共和革命文艺的领导及代表人物，当然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等人。而这些人非但在江青建国后的一些文艺活动（包括京剧革命）中反对了江的极左政策，恐怕在这些大人物们内心深处对江青这个当年的三流演员是不屑一顾的。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在江青这个心理疾病患者的无意识里构成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而在 30 年代的上海和周扬等人公开竖旗对立的是鲁迅。这又使江青产生

¹ 阎长贵：《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 年版。此处作者根据的是此书的电子版。

了把两者链接在一起的被迫害妄想。例如，在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里，她对自己和鲁迅一起受到周扬等人的迫害有如下的长篇描述：

在她有了演员的名气后，几家电影公司找到她强签合同，这时鲁迅出来保护她了。鲁迅作为一名作家，批评电影公司是多么残忍地欺凌演员。最大的电影公司（通过周扬及其党羽的文化运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民党服务）诽谤他和恐吓要杀死江青来反击鲁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鲁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鲁迅那样，她的神经时刻受到敌人的折磨。在说到各种不同的人 and 团体时，她的声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里都有人阴谋杀害她。……他们散布她将被绑架的谣言，实际上，他们正试图逼她自杀。她已经失去个人权利，没有接触媒体的渠道，没有办法去反驳攻击者为自己辩护。在那些攻击者中，很多人控制着媒体。当认识到自己已实际上被与外界隔离了，很容易受到攻击后，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她的健康日渐恶化，抵抗力急剧下降。¹

这一段冗长的表述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自白，完全符合我们在上文引用过的临床症状（“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首先，这里的“受害者”是她虚构的，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材料证明鲁迅和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过交集。当维特克直接问江他们两人是否相识时，江青也只能羞羞答答地说：“在上海时，有人告诉她，鲁迅曾看过她的舞台演出。她脸色微红地回答，强调是听别人说的，她自己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²可见和她一起扮演“受害者”的鲁迅和她的关系是纯属妄想。另外，江青眼里扮演“迫害者”的“周扬及其党羽”也是虚构的。因为30年代的周扬也并不认识江青（按江青的说法，只在田汉家里匆匆见过一面而已）。由此可见，“绑

¹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第120-121页。

² 同上，第108页。

架”、“阴谋杀害”、“逼她自杀”等等骇人听闻的迫害完全出于江青“受害者情结”的外射。这里最可怕的是：因为这种妄想被“广泛及系统化”，这样江在30年代的朋友郑君里、赵丹乃至保姆秦桂贞都在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她的被迫害妄想网络中的某个链接点。而成了江青的疯狂迫害对象。

现在我们就难怪解释为什么不少受了江青残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们的缘由，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在现实中对江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这里解开迷思的钥匙是：他们都在用一种正常思维来思考和判断江青的非正常思维——深藏于她潜意识里的“受害者情结”和被她“广泛及系统化”的受迫害妄想。江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先生所受的迫害便是如此的典型一例。阎长贵先生1967年1月因《红旗》杂志的同事关锋推荐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他转了一封来自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叫“江青”的女干部的信给了江青。出于好奇，阎长贵以为两个“江青”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此事显然触及到了江青30年代的历史，于是就在偶然和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江青的被迫害妄想网络中。阎先是被江青撤了职。不久因为关锋和戚本禹倒台，又被江青进一步“广泛”地妄想为他们安置在她身边专门来迫害她的“坐探”，还偷了江青身边的“毛主席手稿”。阎长贵先生在文革结束后自然彻底平了反，但是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江青会产生如此“荒诞”和“信口雌黄，胡乱编造”。因为“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他的唯一解释是：“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¹阎长贵先生的愤怒和痛斥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只是如果把他的评语“人格低劣”改为“人格病态”，或许更接近事实。因为江青对他的疯狂迫害，很大程度上还源起于她同样疯狂的被迫害妄想症。这些荒诞不经的虚构和想象在江青的无意识世界里还是“广泛和系统化”的，这当然是正常的人所无法理喻的。

小结

因为任何政治人物都首先是人，他们的心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

¹ 见《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的第六部分〈我和江青〉。

性的、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就都会对他们所领导和参与的政治运动发生影响。作这一如是观，这些心理活动，包括病态心理也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江青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多种精神疾病，她是带着这些心理疾患进入这一政治风暴之中的。因为她是毛泽东的第一夫人，并在文革中充分发挥了他们“政治夫妻”的功能，江青一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女人。

尽管精神疾病并不是江青在文革中大施淫威、迫害他人的主要原因，但绝对的权力决没有有助于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疗。相反，权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绝对激发和迅速拓展，使她可以轻易地诬陷和迫害他人，从而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在这一点上，绝对的权力却成了江青变态人格的放大镜。读者或许可以在本文分析江青的偏执型变态人格和她疯狂报复其政治对手和整肃对象的关系中，以及她从受迫害妄想的虚构网络到现实世界里政治迫害狂的奇妙转换中获得一些别开生面的启迪。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她北京保外就医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对于她的自杀，毛派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政治谋杀”。¹她原来的秘书杨银禄则认为是“是因绝望自杀的。她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刑)以后，整整等了15年的时间，看到国内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势已去，想恢复以前的辉煌已经没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于是就横下一条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²杨银禄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江青的心理上的痛苦还和她长期以来所患的抑郁症有关。她的自杀完全可能是她抑郁症最后发作的结果。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就把自杀作为抑郁症的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之一。³此外，这一分析是有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支持的。在中国近年以来的自杀中，大约51%为抑郁症患者，其中至少15%最终死于自杀。⁴江青作为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进入文革的动荡岁月，又最终以一个精神病病人的方式离开了纷扰于她的人世。❏

¹ 秋石客：《锁在云雾里的江青》，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345-346页。

² <江青为何自杀？机要秘书杨银禄揭开谜底>，载“环球网”，<http://history.sina.com.cn/bk/wgs/2014-02-13/175082258.shtml>

³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161.

⁴ 刘晓秋、白志军<中国抑郁症患者自杀危险因素的原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2期，第291页。

【季刊简介】

发刊词

本刊的前身是 2008 年在中國大陸創办的同名刊物。不同的是，前《记忆》是半月刊，只有电子版；现《记忆》是季刊，既有电子版也有实体版。前《记忆》实行会员制，主要面对国内；现《记忆》实行订阅制，主要面对国外。前《记忆》的重点在文革历史，现《记忆》的重点在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

创办这本季刊的目的，一是改善“记忆”的生存条件；二是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一个更广阔更开放的平台；三是开辟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通道，把国内学者的成果带给国际，将国外的成果译介给国内。

为适应新环境，本刊对前《记忆》的栏目进行了调整，在原有的专稿、评论、读书、序跋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综述、译文、学者自述等栏目。研究专为华文作者刊发学术文章而设，综述意为西方的中国学学者提供研究上的方便，译文是译介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窗口，学者自述是学人谈论治学经历、研究方法、师从同道，以及人生感悟的园地。除此之外，本刊将加强读者来信/编读往来的作用，刊发人们对学术研究、学界动向、学界风气的看法和感想。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年，××卷，××期”的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违反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本刊是在美国出版的学术刊物，须遵循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行的写作规范。投稿者请仔细阅读本刊末的《投稿须知》，按照要求撰写论文。本刊对不符合规范的来稿有修改和退稿之权。■

【季刊简介】

投稿须知

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作者需提供所在单位和通讯方式，并请以脚注方式在文章首页呈现。

本刊采用双向匿名的同行评审制度,来稿三个月内如未得到本刊之反馈,请自行处理。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声明。

本刊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为使论文符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行的方法,对论文撰写特做以下规定:

1. 总体要求

资料可靠,论据充分,文字精练,文责自负。回忆性和评论性文章篇幅不超过 6,000 字,专稿、综述和研究性文章字数不超过 15,000 字。论文要求 WORD 文档格式,简体中文。

2. 字

2.1. 字体:一律采用宋体。

2.2. 字号:论文名 14 号,署名、正文 12 号,脚注、注释、参考文献 10 号。

2.3. 加粗:论文名、标题(包括“注释”、“参考文献”、“摘要”、“关键字”四个标题)。

2.4. 位置:论文名、作者名中间对齐,标题左对齐,正文每段开头空两个字符。

2.5. 脚注编号用带圆圈者,如:①、②、③。

3. 行

3.1. 文行距 1.2 倍。

3.2. 空行:论文名、作者名、标题隔空一行。

4. 论文组成

4.1. 论文格式包括:题目、作者姓名、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4.2. 内容提要与关键字:论文超过 4,000 字,必须有提要和关键词。其中,提要不超过 150 字,关键词不超过五个,关键词总字数不超过 25 字。

4.3. 脚注:单个脚注不得超过三行。超过者一律先在脚注中标明注释号,然后放入文末编号的注释。

4.4. 参考文献:详细的文献信息仅在文末的参考文献表内出现,正文中避免。不要求提供原始文件。

5. 标题

5.1. 论文分段采用三层标题,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数字后加“.”。

5.2. 第一层，如：“1.”、“2.”、“3.”。

5.3. 第二层显示第一层的顺序，如：“1.1.”、“2.3.”、“4.2.”。

5.4. 第三层显示第一、二层的顺序，如：“1.1.3.”、“2.3.5.”。

6. 数字

6.1. 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1966年5月16日。

6.2. 测量、计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超过三位用分节号。如：5.4千米，6,124人。

6.3. 大约数量：有具体数字的用阿拉伯数。如：约150人，30,000多人。无具体数字的用中文。如：数十辆车，几百万人。

6.4. 成语和俗语用中文，如一针见血，不管三七二十一。

6.5. 其他：十以内用中文，十以上用阿拉伯数字。如：比赛有五个项目，12名选手。

7. 引语

7.1. 直接引语：较短的引语用双引号，直接放在句中。

7.2. 以单独段落呈现的引语，该引语仍用宋体，不需改为其他字体。段落整体向右缩进两个字符，不加双引号，并与前后正文各空一行。

8. 内文中的引证

8.1. 只列出作者名、出版年、页数（出版年与页数之间用冒号隔开，用“-”表示“至”）。如：（王年一 2005:20），（乔晞华、张程 2015:9），（胡杨、乔晞华、张程 2019:139），超过三人用“等”，（韦陀等 2019:123-124）。

8.2. 只列出出版年、页数。如：王年一（2005:21-23）谈到…，乔晞华、张程（2015:1-3）认为…，王年一等（2005:15）反驳说…。

8.3. 多位作者用顿号隔开。如：胡杨、乔晞华、张程。

8.4. 多篇文献用分号隔开，按年顺序。如：（王年一 2005；乔晞华 2019）。

8.5. 引用网文须注明文章名、网址及最近登录时间。如：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

<https://wenku.baidu.com/view/ca69dac6a1c7aa00b52acb25.html>。最近登录时间：2017年3月15日。

9. 文末参考文献

9.1. 参考文献按第一作者姓的拼音排序。

9.2. 著作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书名。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

(1) 王年一。2005。《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 张程、乔晞华。2015。《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9.3. 期刊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期刊名（用书名号），期刊卷数、期数（之间用冒号）与页数（之间用逗号）。如：关向光。2006。

“文革再认识。”《展望与探索》，4:6期，第7-11页。

9.4. 编著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页数。编著名（用书名号）。编者。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徐友渔。2007。“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第594-606页。《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

10. 外文的使用

10.1. 如果参考文献是中译本，必须用中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外文，可以在脚注中引入。

10.2. 如果参考文献是外文，必须用外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中文，可以在脚注中注明。

10.3. 正文中尽量避免外文的出现，除非必要。如为了区别外文（如：Movement 和 Campaign，或 Game 和 Play）不同概念的意义。否则不建议使用外文。❏

【季刊简介】

征订启事

《记忆》季刊是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份国际性的中文学术刊物，是原同名电子刊物的升级版和实体化，其刊号是 ISSN, 2687-9964（实体版），2687-9972（电子版）。与原同名刊物不同的是，它关注的重点是中国近百年来思想文化。

《记忆》季刊每年四期，每期20万字左右。设有专稿、研究、序跋、译文、综述、学人自述等栏目。专稿是本刊主编所约之稿，研究是作者投来的学术论文，序跋刊载近期间世的中文著作的前言、后记，译文是对西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综述是本刊组织的，介绍某一领域研究情况的文章。学人自述是学者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治学心得、师从、同道、方法、著述的介绍和总结。

一般来稿，一经刊发，本刊会给作者惠赠当期的电子刊。凡重点文章，本刊将给作者奉上实体刊。凡经双向匿名评审通过的综述性文章和学术论文，本刊除呈送作者实体刊之外，还将略付薄酬。❏

【资料】



张晓良来鸿

在网上看到某拍卖会拍品介绍：照片拍摄了毛泽东、周恩来、关峰、戚本禹、江青、康生、叶群等文革期间的关键人物，从照片上来看，现场气氛融洽，这是一张少见的文革前期领导人的会议合照，品相完好。作者佚名。

【读者来信】

1. 如雪勘误

方延曦《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一文，发现 2 处笔误：

页 43：当局千方面（百）计回避并有意掩盖的问题。

页 48：1974 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企图打到（倒）周恩来未逞。❏

2. 蒋健纠错

276 期刘家驹的遗作有几处小错：16 页和 21 页的两个“1957”均为“1958”之误，这是常识；27 页的“杭州刘庄”应为“杭州汪庄”，见张耀祠回忆录。❏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